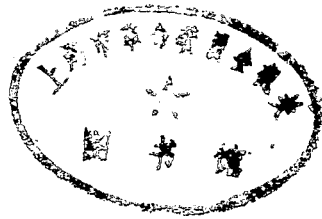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著



82.123  
106  
2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著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54364



B 206835



# 自序

從前陳龍川做了一本「酌古論」，批評古人成敗，於三國人物論列尤多。大概他那年紀很輕，屬於年輕的好事一類。但他的議論，嚇倒了當時正統派的道學家和歷史家，認為是狂士之流。直至虜清的張之洞，也還擺出他寫「勸學篇」那種道貌岸然的樣子，對酌古論題了一首詩，說：「兵食無籌治本疏，秀才酌古論孫吳，朱辛都道龍川好，北固樓頭一洒徒。」我這本三國人物新論，自然也不免屬於年青好事之例，但却并不敢媲美前賢。寫的動機，也沒有存什麼深意。祇是偶然重讀了陳壽的三國誌，對三國人物也偶然的偏嗜，信筆雌黃便湊成這一本小書。

歷史，不是我研究的本行。我對歷史的看法，以為歷史和寫成的歷史當有不同。我們摩挲歷史，批評古人，就頗不易，但唯其如是，我們也值得從寫下來的歷史中，摸索絲跡，給予新的論斷，雖然這種論斷，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歷來史論一類的書，與其謂為根據客觀事實的成分多，無甯謂為主觀論斷的成分多，這本小書，我承認祇是我個人對於三國人物的主觀論斷，即便說是對古人的重新評價，也完全是一己的私見，我並不反對讀者或會指摘我，對古人的曲解與偏見，雖則我也曾從歷史仔細研究過那時代

的社會和環境來論衡這些人物，畢竟也不過是個人的臆見而已。

三國時代，分士爭雄，在歷史中，是一個很有趣味的階段。諸葛武侯撐持蜀漢局面，處境最難，但終諸葛之世，魏兵不能南下，隆中對關於軍事、政治、外交的策劃，是最精當的決策，蜀漢的歷史，可說是諸葛血汗一手所寫成的，微諸葛不能成天下三分之局，歷史也許改觀。魏曹也一代雄才，不愧爲一卓絕之政治家與軍事家，未可以世俗所傳之見薄之，吳孫權有東江，英明的孫策，創基於前，恢恢大度的孫權繼承於後，物饒民富，內政修明，可惜是內有山越心腹之患，外無政治號召之資，因此祇能守而不能攻，但以人物而論，爲相十九年的一代良輔顧雍，精明強幹的政治外交家魯肅，都是極可敬愛的人物。總之三國人才輩出，各有千秋，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試重新給各一番評價，雖屬多事，想來也有同好吧。

三國歷史見傳於後世，祇有陳壽的三國誌和常璩的華陽國志。其他漢晉春秋魏略，襄陽記之類的書僅見引載，全書不可復睹，陳壽的三國誌自是一部好史書，但他在晉朝做史官，所紀想必有許多迴避之處，論贊人物，也未見全出公允。譬如贊譙周一爲世傾

儒，有董揚之規，「對他降魏的無恥，不敢貶一詞，論諸葛「將略非所長，」頗有暗昧司馬懿軍事長才之嫌。有人說他撰述三國誌時，有一二當時顯赫人物遺而不敘，原因是那些人的後嗣沒有孝敬他，所以不肯下筆，這雖未必有其事，那一二顯赫人物現在也無從知道是誰，但將軍向寵，爲蜀漢重臣，暢曉軍事，劉先主稱之曰能，見諸諸葛出師表，陳壽無專傳紀載，僅在向朗之後略提幾句，不知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人？其他敘事在魏蜀吳各書中比對起來，亦間有出入的地方，古來歷史傳紀，此等處都在所不免。由於三國誌鋪張渲染而成的三國演義，則是小說家言，可以說是一本通俗的歷史小說。作者在演義裏，處理那繁多的人物和情節，井然有條，手法自是超卓。但三分歷史，七分渲染，究與信史有別，其人或出杜撰，如貂蟬。其事或出臆造，如孔明借東風。但演義一書深入民間，影響之大，非陳壽三國誌所能及。大抵趙宋以來，說書之風甚盛，草市茶社，說書者以歷史故事爲題材，當時屬於三國故事的話本必很多，三國演義或亦源有所自。但現在三國故事，僅此演義一書傳誦於世，三國人物的婦孺皆知，膾炙人口，大半由於演義一書的影響。至於我這本小書，舉凡人物論列所據，并不涉及演義，可說與演義

無關，應該在此聲明。

近來陪都談論三國人物，忽成風尚，大概四川爲蜀漢之地，入川人士，景仰諸葛武侯等人物的遺音宛在，倍覺親切。這本小書於去年春夏間卽陸續寫成，偶在各刊物發表一二篇，據說讀者也還歡迎，朋儕或更以三國專家相諠，專家自另有其人，區區實不敢當。至於有勇氣付之梨棗，也并非應時，實出於吾友韓侍桁先生一再索稿催促之故。

吾友歷史家羅香林先生，和陸丹林陳邇冬兩先生慇懃寫成甚力，均致感謝。

卅四年六月廿五日·陪都

# 目錄

一	諸葛孔明新論	一
二	論劉備與曹操	一五
三	論孫吳	二八
四	論魯肅	三九
五	論司馬懿	四六
六	論關羽	五六
七	論名士孔融	六五
八	論顧雍	七五
九	論曹丕與曹植	八六
十	論魏延	九六
十一	論漢奸譙周	一〇六
十二	論三國中兩個女性	一一五



## 附 錄

- 十三 論諸葛的外交與軍事……………一二一
- 十四 論諸葛的政治措施……………一四一
- 十五 論「論諸葛亮」……………一五七

## 一 諸葛孔明新論

### 一

諸葛亮初出草廬輔助昭烈的時候，才是二十七歲的青年，昭烈那時已經是四十九歲，以年近半百的老英雄居然肯兢兢於這樣年輕的小夥子，究竟也算謙虛；但從另一方面看，昭烈那時正是走頭無路，落魄投荒，訪顧孔明，也並非是怎樣了不得的一件事。「三顧」的故事大約古人也有質疑的；如魏略和九州春秋曾說：「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然而這記載並不確實，三顧草廬不但見於蜀書諸葛傳，最可靠的材料還有他自己的出師表，裏面曾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這可證明亮非先去求差。當時這位年青小夥子大概臉上并無一點稚氣，一望便覺年少老成，又兼是山東人的高個身材，湖北人化的一張會說話的嘴，所以一陳利害，略吐機謀，昭烈就「如魚得水」。

但情形自然不會如此簡單，我們現在祇說諸葛亮臥隆中，這「臥」字并非真實。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就學起隱士臥吟，大概必無其事，若有青年也學起諸葛亮的臥吟以待明主光臨那才是活該。諸葛亮之所以名爲臥龍，正是策士的一種技倆。他宣傳「臥」來顯示自己的身價，他必非整天悠閑自在臥吟，相反，他一定好學深思。（雖然看書祇看大略）他隆中自然有不少書卷和地圖，他天天在寫計劃，草方案。此外，他會有情報網，座談會，說隆中是他的隱所，無甯說是他們的會所，所謂他們，就是諸葛亮、徐庶、司馬德操、崔州平、石韜這一羣。他們都是同夥，諸葛亮却是這個小團體的老大哥，他對昭烈指陳天下大勢利害，侃侃而談，當時的山川人物無不羅列在胸，非關心時務常有情報消息者不能有此，當昭烈屯兵新野時，徐庶是顯然有意向昭烈游揚諸葛亮的，他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又據襄陽記云：「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和司馬德操這種引薦方法大概就頗有計劃。非如是聳聽，昭烈不會屈

尊，既屈尊而仍一再播駕至三次才出見面，無非是一種術，這就是以退爲進，以避爲就的方法，大凡一個人才必欲出而致用，使人「知」而用之，不如使人「敬」而用之，「敬」而用之更不如使人「求」而用之。能使人求而後才爲所用，就有地位，有身份，大有別於場中聽用。諸葛亮是一大策士，他使昭烈三顧而後出見，就是使人「求」而後爲用，他的出處比蘇秦、張良還要有聲有色。這是諸葛亮出馬施展手段的第一次的成功。

我們說諸葛亮是一大策士，這「策士」兩字的含義還須相當說明。大凡策士並不單含有政治家的意味，也不能籠統說是相當於所謂「智囊」，用現代的稱謂來說，最好解釋爲「幕僚長」和「參謀長」的合一，幕僚長是屬於政治方面的，參謀長是屬於軍事方面的。幕僚長而兼參謀長就是策士。因爲策士不僅要策劃政治，而且要策劃軍事，古來的策士，類皆「文武兼資」。我們以此來看諸葛亮，他真是策士的代表典型。

## 二

魏蜀吳鼎足三分之局，諸葛亮對於蜀漢的建立確有正確的妙策。我們把它歸納起來，可謂爲三策。據蜀和吳是第一策。安內攘外是第二策，平蠻伐魏是第三策，這三策都

是正確的，也就可說是他們的抗戰建國綱領。第一策的據蜀和吳，是建立根據地和尋求與國。巴蜀土地肥腴，鹽糧充足，足以自給自足，並且「益州險塞可戰可守」。這一重要資源區域和軍事勝地的佔據，在當時不能不說是諸葛亮高瞻遠矚的卓識。至於孫吳力量當時實較昭烈為強，一面借為外援，一面免樹多敵，聯吳的外交政策也絕對是正確的；這一策是實現而且成功了。第二策的安內攘外，是充實國力先謀內政修明，富國強兵，然後才發動對敵攻勢。當時佔據益州以後，史稱其「下至橋梁、道路，井灶圍溷，無不修繕。」并且厲行法治精神，嚴峻以治。「撫百姓，示儀範，約官職，從權制」。這一套都是「安內」的政治上的刷新與建設。孔明之所以不能不亟亟要「安內」者，也是因為「劉璋闇弱」，蜀中政治已弄得一團糟，更恐有潛勢力滋伏其中，將來易萌變亂，所以要先來立威立信，使人心安定，基礎鞏固，才能向外發展，這種政策是天經地義的；這一策也實現而且成功了。第三策的平蠻伐魏，可謂屬於軍事攻勢的戰略，爲了北伐必須先鞏固四川外圍，南征平蠻，道理就在鞏固外圍，滅出後患。於事實有必要，於戰略爲必然，可惜這一策（最關重要的最後一張牌）上半截平蠻成功了，下半截伐魏却遭了大大

的失敗。但這一策失敗與孔明這一策的本身無關，孔明這一策仍然是絕對正確的。失敗的原因在於軍事的行動方面和其他另一些原因。先從軍事行動方面而言，作爲策士的孔明無罪，作爲軍事統帥的孔明却有大大的過失。過失在什麼地方？在於軍事運輸上佈置未周，給養線的聯絡不佳，致全盤的軍事計劃往往毀於一旦。我們試一檢討，從建興五年以來，孔明曾幾次大舉伐魏，六出祁山，但往往是「糧盡引還」。六年圍陳倉，九年圍祁山，都因此失敗。勞師遠征，一而再，再而三，都仍然不能解決軍糧軍實的運輸供應問題，元氣士心未免大有影響。（郭冲四事曰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雖然孔明竭智想出木牛流馬這些方法來運糧，但小巧的玩意顯然不能收大效。直至最後一次出兵斜谷，據五丈原仍然「患糧不繼」，（見傳）要分兵屯田，兵士自耕而食，情形就很窘。魏書說「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孔明雖未必就窘到如此地步，但當時憂心之事在於糧餉不繼却一定是實情，由此而憂瘁致疾，也是情理之事。我們祇要看孔明那時屢向魏兵挑戰，魏兵不出，因而用到將女人的衣服送給司馬懿這種焦急的「激將」方法情形，也就可以證明蜀軍其時大概已糧草不多。唯其弱點在此，所以

司馬懿應付的方法，就用堅壁清野按兵不動的戰術，以我大胆的估量，即使諸葛亮不卒於軍，那一次也仍然不能得到最後勝利，却又是「糧盡引還」，當時由蜀出兵至陝甘地帶，千里迢遙，其時既無飛機與汽車，軍運自然也不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可是諸葛亮的軍事才智，用將用兵，佈陣設謀，倒還來得，祇是軍運供應的計策就有點不甚到家，雖然我們今日看他遺著的十六策「軍事第九」一篇，也有「貧於遠輸，餓於遠輸」的話，但他却不能實際解決軍事運輸問題。從前一句古話說「三軍未動糧秣先行」。無論古今的行軍，糧餉的有關大局的勝負是一例的。諸葛亮第三策伐魏的不能實現，軍事上失敗以致「未捷身死」，原因就在於此，從前人也有一批評諸葛亮「將師非長」的。陳壽就說：「亮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個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此雖連年勦衆，未能有克。」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有載：「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陳壽所評，認爲亮政成就大於軍事。張儼所載，簡直批評亮在戰略祇能取守不能取攻。但都沒有指出亮伐魏的軍事失敗原因在那裏。如果我們籠統來論列諸葛亮

「將略」的優或不優是不中肯的。就使把絕頂於軍事人才，他也不能樣樣都十全十美，更不能「不許有某一點失敗」。從某某一點失敗遂判斷其整個「將略」的優或不優，這真是「以成敗論英雄」。說諸葛亮將略不優嗎？他的治軍布陣，都有成就，司馬懿在他死後退軍，看他駐兵的營壘處所還贊嘆是「奇才」；蜀兵人數本來也不多，但南征北伐，到處用兵，以少敵多，成爲勁旅，非優於治軍者不辦！（蜀兵少，連年征，傷亡之數必衆，與張郃戰街亭一役，亮拔西縣千餘家還蜀，這是補充兵源的一種做法）。我們不能籠統下一斷語說他是一個政治家而軍事非所長，我們祇能指出他軍事上失敗之點在那裏。

伐魏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外交上聯吳還沒有做好。但這個缺憾，孔明可以不負責，還是昭烈的意氣用事所致。當關羽攻曹仁于禁，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的時候，關羽躊躇滿志，意態甚驕，孫權更遣使爲其子向關羽的女公子求婚，關羽千不該萬不該竟辱罵其使不許，親家做不成反做了冤家，給魏人一個絕好離間的機會。史稱：「司馬宣王將濟以爲關羽待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



於是孫權既妬羽的驕矜，又惑於魏的利誘，便勾結他的屬下躡據江陵，因此關羽送了一條命，送了命不要緊，蜀吳的邦交從此就有了裂痕。這在關羽，一個簡單頭腦的軍人，自然是一種過失。但一誤再誤，昭烈竟因此而撕破聯吳的政策，出兵攻吳，遭致大敗。梁啓超曾以意大利的加布兒與諸葛亮相比，認爲蜀的不能統一天下，咎不在亮，而在劉備之才不及意王維克杜爾。備不用諸葛謀，失敗在攻吳。（意大利當時興起於撒的尼亞，聯法抗奧，卒能完成統一之局。）實在鼎足三分之局，全繫於聯吳的外交政策，這是諸葛所堅持主張的，而劉備卒不能忍耐。當他攻吳失敗時，諸葛亮曾慨嘆地說：「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會不東行。」梁啓超先生的批評甚有道理。以當時的形勢而論，蜀雖基礎日固，但魏還是一大勁敵，吳對蜀也不能沒有顧忌，蜀要達到統一的局面，北進攻魏，聯吳更須加緊，最上的戰略是聯吳台攻。這更要運用外交手段，向東吳陳以利害，締結攻守同盟，在軍事上進一步合作。但事實不然，既失好於先，又疏防於後。關羽受害，江陵被據，六出祁山，迄無寸進，遂使艱辛造成的優勢局面，一蹶不振。這是大可惋惜的事情。

孔明的政治軍事才識，自然都可謂第一流。政治的處理千頭萬緒，而且在「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四川，更不容易，大概他爲政主嚴明，所以吏治澄清，民生安適，這也就是陳壽偏重他的政治才能，批評他「理民之幹，優於將略」的所在，但孔明的唯一長處；我以為是在人事的應付上。他應付人事的才能確爲古來第一人。終孔明之世，內部人事布置不獨井井有條，并且融洽相安，絕少派別之事，這種消弭傾軋，使各人精誠相與的風尚，無疑是孔明應付人事手腕高明所致，孔明初出茅廬，年紀既輕，資格又淺，昭烈三顧的時候，和昭烈患難相交追隨多年的關羽張飛，本甚不滿，但孔明出掌軍政，大權在握，羽飛等并無閒言，且樂於受調度，此中已頗見工夫。我們且舉一事爲例：馬超來降，羽馳書給孔明問超「人才可誰比」？因爲馬超歸降時地位頗高，關羽是「剛而自矜」的人物，顯然有些矜嫉之意，但孔明的覆信是：「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隳彭之徒，當與益德并馳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這種高帽政策，便使驕矜的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又昭烈據蜀後，孔明對於人事的佈置甚有用心。法

正這一個人用他爲蜀郡太守。史稱其爲太守時，「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雖然有人說他閑話，但孔明正要如此用他。因治蜀須用嚴，而法正也是劉璋的下屬。可使其收拾人心。董和，劉巴等都羅致高位，也是用以融洽蜀人的。孔明對於每個人的才能和品性都了解得深切，在他出師表中，曾歷陳人事的如何，使後主知所接近，宮中的事叫他去問忠誠老成的費禕，董允；營中的事，叫他去問曉暢軍事的向寵。他如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等諸角色，都安排得恰如其份。又如說吳攻曹一着。孔明對孫權用的是「激將法」。他了解孫權這位英雄的「好勝自負」的個性，便把握着他的弱點來激動他：「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這幾句話便使孫權忍受不了。於是便不能不出兵相助，而孔明的連吳攻曹的政策便大奏膚功。還有劉備東吳聯婚一事，顯然是「一種政治作用，但聯婚所以能夠成功，也在人事的應付得宜，我們雖不能以「三國演義」裏所描寫送禮買好喬國老這種小說家言爲信，但對於魯肅的勾結，使其從旁贊助是顯然的。凡此，孔明善於人事應付的例，倘再細心爬梳一下，定可再舉不少。且不具列。

其次，孔明的政治才能，是表現着法家和儒家的優長。他以「管樂」自許，又曾爲

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申韓管樂是法家。有人也比孔明爲伊尹周公，說他是儒家，他的許多仁政，也是從儒家而來，從他的政治上措施說，「示儀範，約官職，從權制，雖難必賞，雖親必罰。」自然是法家一套。當時連法正也覺得他太嚴峻，曾引秦亡漢興的往事諫他，孔明的理論是：「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政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併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又華陽國志曾載：「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廢廖立，斬馬謖，都是孔明的厲行法治處。」

然而孔明也不能一定派在那一家，實在說他是雜各家之長的實際政治家。

#### 四

然而天下無完人。我們不能把人作爲神看。孔明有他的長處，自然也有他的短處，

我們要指出他之所長，但也不必掩蔽他之所短。他的短處，第一，就是祇知用人而不知培養人，說得時髦一點就是沒有培養幹部計劃，和不知扶掖繼起人才。所以終孔明之世，雖可人盡其用，等到他「鞠躬盡瘁」死了之後，便沒有人能承繼他的責任，擔當得起大事，使蜀祚得以延長，他的遺志得以完成。不甯唯是，就是優秀的幹部也後起不繼，不能新陳代謝，到後來竟至「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我們試看孔明死後，馬上就有魏延之變，而操權人物，楊儀蔣琬等，都不過是勤慎君子，當不起大任。諸葛瞻愚忠有餘，才智不足，姜伯約雖明兵事，而權不在握。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繼起負全責的，但這是孔明的錯處，他平時沒有準備繼承他的人，不肯培養可以繼承他的人的地位。魏延之變，顯然是和楊儀積不相能之故。蔣琬費禕，和楊儀，平日地位差不多，所以孔明死後，大家便有點各不相下，彼此爭執。姜伯約本來是孔明所看重的人。曾說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又說他「敏於軍事，既有瞻養，深解兵意，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可惜因他是半路來歸，并未把他的地位提高，不足以統攬大權。後來費禕常裁制他，一與其兵，不過萬人

」。到了後主投降，他的部下還「拔刀砍石」，也不能不說是一個人才，華陽國志曾有一段這樣的話：「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投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寰宇傾而復奠」，可見姜維或者也真有大志，祇是人微言輕，又碰着這位不長進的阿斗皇帝，便不能有所自顯，假使孔明當時也能把他地位提高或遺言以他作爲繼承人，或者後來會另有一番局面，也未可知。

第二，孔明還有一個短處，在於謹慎有餘，信己太過。這點，可以舉他「親校簿書」爲例。稱贊孔明的人，也許會將這件事作爲孔明勤勞的美德，但若將孔明視爲一大政治家，視爲一身繫邦國安危的重臣而論，「親校簿書」却不無可疵議之處。當時巴郡太守楊子昭也會諫他說：「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慮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這話顯然也有點非議。從前漢文帝問周勃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數目，周勃不能答，陳平代他的答點是：「各有主者，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

帝說：「然則丞相當治何事耶？」平答：「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孔明當時是宰相，并且一身繫邦國的安危，簿書之事，本來犯不着親自躬爲。雖然勤慎任勞，却與大處無關。祇信任自己而不信任別人，也就是不信任制度；其實，祇要百官得其所，正如楊子昭所說的，「位分適宜」，用人得當，又何必事事親爲。孔明以他地位之高，責任之重，關係國家前途之大，當自知留有用的精神去策劃大計，把精神耗費在小事情上，未見爲智。我們知道孔明五十四歲便盡瘁而死，蜀漢命運也隨他的命運而消逝，雖則在他是盡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耿的赤忱，但勞而不獲，人亡政息，也未免是一件憾事。

## 二 論劉備與曹操

「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是曹操對劉備所說的一句話，這句話在現在看，固是爲他們兩人下了歷史的註腳，但當初曹操這句話，却没有料到劉備以後果真成了英雄，能有如許成就。曹操說這句話，正在他意頗自得的時候，他說劉備是英雄，并非出於有意的恭維，不過是「意頗自得」的矜誇表露，順便拉上劉備而已。假如他認爲天下英雄除他自己外祇有劉備，也許就不這樣當面隨便說了。實在說來，他何嘗把劉備放在眼裏，看作和自己等量齊觀的英雄，他那時正將劉備作爲他的幹部，他的助手。我們要記得，那時的曹操環境已經非常好，在政治上耍了一大套把戲，已經捧着那位獻帝定都於許，軍事上也早擊敗袁術，呂布等，確立了基礎，不過只賸下一個袁紹尙待收拾而已。而劉備呢，給呂布一次兩次的戰敗，并且連老婆也給擄了去，正是走頭無路，才投奔在曹操的麾下，還那裏會使曹操有「英雄你我」之感？所以另一種作用，倒可說是曹操當



時勉勵劉備的。曹操未將劉備當作和他敵體的「英雄」，却將他當作是份人才而欲收爲己用，試看他爲之出兵報仇，奪回妻子，「待之厚禮」，這倒罷了，更要「出則同輿，坐則同席」。所以籠絡而示恩的方法，可謂無所不至。他顯然是想劉備成爲他的一個可靠的幹部，他正需要這樣一個「有一份人才」的助手。恐怕曹當時所想到和他敵體的英雄，卻正是袁紹而不是劉備。我們聽他說了「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一句之後，接着是「本初之徒，不足數也」。這正是他心上的一根刺。袁紹（本初）的兵力當時還是相當雄厚的，曹操曾經因爲袁紹不肯歸他麾下，拒絕接受太尉一職，連忙把大將軍的頭銜也讓給他，可見所嫉所畏在此不在彼，「不足數」就正是「足數」的反語，而用以自勵而又勉勵劉備的。假如他認爲天下英雄數不到袁紹，他就根本不必說後面那一句了。

但曹操感覺到劉備也可能成爲一個天下英雄時，那是在劉備出都，韋承等事洩伏誅之後。他大約也會連想起劉備那天吃飯 倉皇失箸的一種情形，所以他親自出兵打劉備了。當曹諸將說：「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曹操說：「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但起初劉備未降時，有一位程昱也會對曹操

說過：『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曹操卻沒有理會，這正說明曹操視劉備爲英雄，也正在此時不在那時。

但在我們看來，劉備真的成爲一個與曹操爭天下的英雄，仍是在諸葛亮輔翼之後。這並非說劉備沒有諸葛亮就不能成爲英雄。備的『不爲人下甚得衆心』的英雄氣概是千真萬確的。可是他要成爲『與操』爭天下的英雄，我們不能不說全靠諸葛亮爲他撐持。沒有諸葛，雖會有劉備個人的英雄歷史，却不會有蜀漢立國的英雄的歷史。蜀漢的歷史，是諸葛亮血汗所寫成功的，劉備父子倒反是一個配角。儘管劉備具有英雄野心與氣質，但他仍缺少英雄建業的策略，建業的策略是屬於政治性的，沒有政治才能和方策的英雄，祇能成爲一個市井（廣義的）的英雄。備正屬於這種英雄典型。

我們仔細分析，魏、蜀、吳、三國的領袖，都各有不同之處。吳的孫權是藉父兄之蔭，據有江東，物產豐裕，有如執袴子弟，全是一副大少爺派頭。蜀的劉備從市井出身，靠自己的拳頭打出天下，結納豪俊，收服人心，全是俠義的英雄本色。魏的曹操文武兼資，具政治家的手腕和雄圖，挾帝統以自重，是野心的政治家的風格。東吳爲了是執

袴哥兒，終無驚人的成就，另文敘述，本文暫按下不提，且專就劉曹來作一比較。

第一、劉備雖是漢室後裔，但其淵源頗遠，史上祇說他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裴松之註也說：「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他當時之所以要強調說是漢室之後者，自是政治上的作用。他的祖父雖也做過小官，但他父親就並無着落，從「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蓆爲業」這敘述看來，他的家庭早已是一個破落戶，而變成了賣草鞋的出身。後來少年時代他結識的所謂「豪俠」，都多半是市井中人，他還是得到一兩位販馬發財的馬販張世華蘇雙等的幫助錢財，才能「合徒衆」有一班手下，成爲一幫的頭目去剿黃巾賊得到功勳的，這就是我說他是市井英雄的根據。我們再看他「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好交結豪俠」的作風，也足以說明他的市井英雄氣。而曹操的出身却不大同，他不是市井出身而是世家出身，父親是一位大官，他自己二十歲，便舉孝廉，魏書說他博覽羣書，以能明古學，也曾徵拜爲郎，這是曹劉出身的不同。

第二、劉備不能說有什麼學問，祇是能「仗義疏財」，「與衆甘苦」。懂得做一幫

領袖的道理，書卷氣是談不到的，而曹操的學問却很有根底，從文學以至兵書，都造詣很深，他的詩也做得很好，劉備却絕對不能做詩；他會寫兵書，會注孫武十三篇，又編了一本「兵法提要」，劉備却絕對不能寫兵書，所以曹操本身就是一個才兼文武的策士，這是曹劉學問上的不同。

第三、曹操優長於「權術」「智術」。史稱其「少機警，有權數」，他的誅董卓，擄帝遷都，一切政治手腕的運用，都是一種權智。劉備沒有他這種長處，他的行為帶有一點鹵莽和率直，却不能有野心的技巧。譬如後來因為關羽為東吳襲擊受害，劉備一個感情衝動，就出兵攻吳，破壞整個聯吳外交政策，這決不是智者之所為，他不了解孔明聯吳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變成「小不忍則亂大謀」。從論理觀點來說，關羽是他的異姓弟兄，雖可謂之義，從政治觀點上說，便只好謂之不智，這是劉曹政治作風的不同。

第四、劉備是憑藉他的羣衆，而取得地位的，曹操却是憑藉他的政治勢力而取得地位的。劉備對於他的羣衆，他的幹部，愛護備至，他知道羣衆幹部是他事業的基礎，即在極端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不忘他的隊伍，當曹操追擊他，敗走時，他擁衆十餘萬，輜

重鈔千輻，有人對他說，趕快走罷，現在雖擁有衆兵，但是武器却很少，倘曹兵追至，拿什麼來抵擋！當時劉備却說：「夫濟大事必以人，今人歸吾，何忍棄之。」這正是他的長處，所以幾次失敗，不久舊部仍然來歸，而關羽在魏，曹操雖待他客氣，如何愛重，結果也終歸附劉備，他的得人心如此。曹操因爲不是憑籍隊伍而起，他有政治地位，善用兵，也就並不怎樣看重他的隊伍與幹部，和部下共甘苦的習性，曹操是沒有的，這是劉曹憑藉上的不同。

第五、劉備的顛沛流離，幾次失敗，屢蹶屢起的生活，曹操是沒有經過的。曹操的事業，可謂一帆風順，困厄的局面頗少，劉備却歷盡苦辛，蜀地不同於魏都，逆境不同於順境。劉備的事業是赤手空拳打出來的，曹操的事業，却獲得了許多先天後天的優勢，這是曹劉環境上的不同。

這幾點不同的比較，在各人本質上來說，尤其從政治觀點上來說，曹操實佔了上風。曹操的成功，在誅董卓（政治上的成就）滅袁紹（軍事上的成就）以後，就可說已奠定了大局的基礎，其後雖然天下三分，東吳根本雌伏，蜀漢祇成割據之勢，可守難攻。

然而，如何取得這種基礎，實由於他的超絕的政治才能。董卓和袁紹在當時都是他的政敵，勢力地位都比他強得多，尤其是袁紹曾經擁兵百萬，兼領冀，并，青，幽，四州地盤。當時會請帝徙甄城，曹操拒絕，曹操對付袁紹的策略，就是挾帝自重，這樣袁紹既不能公然領兵直入許下，揭洛陽，以冒天下不韙，曹操就可借擁帝之名，面日漸坐大圖強，等到軍事布置就緒，便進而消滅了他。假如曹操有政治野心，而沒有政治手腕，祇有懷抱而沒有權智，也許是董卓的天下，也許是袁紹的天下，也許他竟做了董卓、袁紹那樣的下場。

總之，曹操是一個卓越的政治人才，劉備却是市井英雄，魏蜀成敗的關鍵，也不無於此有關。也許有人會問，市井英雄統一天下的并非無例，卽如漢高，也不過一個市井英雄而已，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才能，但居然壓倒楚國，統一了天下。這理由是要看對手的人是個什麼人物，楚項羽是一個鹵莽滅裂的軍人，簡直是一個有勇無謀的草包。連一個范增也不用，所以漢高能勝過他，劉備的對手是有政治才能的曹操，市井英雄碰着了政治家，就不能不輸了一籌。但有人還會問，劉備雖是市井英雄，却也有一個卓越政治

才能的諸葛亮，也等於漢高之有張子房，不見得就比曹操差？這理由，我前面說過，蜀漢的歷史是諸葛亮血汗寫成的，沒有諸葛亮，三分之局也許還不能成立呢。諸葛亮雖撐持三分之局，但以地理環境關係，也終於不能不輸了魏國一籌了。

在三國志演義裏，也曾將劉曹作了一個很明顯的比對的，但它的比對是站在一般宗法社會的立場，勾畫出「忠」與「奸」的險譜，更從許多虛構的事實舖排的描寫，烘托出曹操之所以是「奸雄」，劉備之所以是「仁主」。因此一般市井大眾所感覺曹操的臉譜，就是相傳下來的一「奸」像，曹操成了「奸雄」，「奸」的象徵。但若就政治鬥爭的立場來說，是無所謂忠奸的，以國家的利益，民衆的利益，來作依歸，我們可以判別忠奸，但在漢末天下紛亂，羣雄並起之際，各人都有家天下的野心，各人都爭雄鼎立，謀自己發展做勾心鬥角的政治鬥爭，根本說不上何人爲忠爲奸。終曹操之世，他還不敢僭稱帝號，僅是挾帝自重，劉備在曹丕稱帝之後，也就登位改元，以帝統自居，在曹操當時不僭位，在劉備當時即帝位，都是政治上環境所決定，無關於忠奸。當時天下滔滔羣雄，所爭取的最終目的，自然是想做皇帝，誰也懷此野心，一切的掩飾是徒然的。

由於「奸雄曹操」的看法，於是由「演義」一書而來的他的「奸」的行爲，便成爲大衆所熟知。最明顯的，「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這一句話便確定了曹操「奸」的個性與行爲。這一句話是純自私的，是損人益己的，曹操因此成了大衆憎恨的對象。然而，這句話的來源，是演義描寫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時所說，並沒見之正史。陳壽的三國志僅言曹操不肯受董卓所授驍騎校尉一職，「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祇載：「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刦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擊殺數人。」至晉孫盛的魏春秋才說：「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旣而悽愴曰：甯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演義的根據殆在於此。但依常理說，呂伯奢既是曹操故交，曹操又肯光臨其家，就不致會存心疑他，也不致聞食器聲卽以爲圖已。倘依魏書所載，伯奢之子與賓客共刦太祖取馬及物，曹操爲自衛起見，擊殺數人，也不過是「人負我，我負人」而已。但孫盛的魏春秋本是一本雜記性質的書，頗多附會，難以取信。在同書中及曾轍及司馬懿脫鄭小同一事：「小同（鄭康成的孫）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



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就之。」「這裏所記司馬懿所說的：「甯我負卿，無卿負我。」和曹操所說的：「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彷彿相同。孫盛根據傳聞，張冠李戴，以司馬懿的事附會爲曹操之言也有可能。

至於演義裏另一杜撰陳宮放操及曹忘恩負義一事，各書都無記載，純是小說家的渲染。

若從淺薄的道德觀點而論，劉備又何嘗不可以成爲一個忘恩負義，反覆無常的人，且舉他幾件大事：他臨薨對諸葛亮說的話是：「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對後主及魯王所說的話也有「但以卿兄弟爲念」之詞，以孔明鞠躬盡瘁的忠忱，劉備所說的遺言如此，一個曲解，也可說是對不起孔明。呂布虜劉備妻子，劉備求和於呂布，布使他并勢擊袁術，在泗水上相道相樂，當時呂布的部下有人說劉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後來劉備果然再合兵擊布。這是第一個反覆。後來再爲呂布所敗，投奔曹操，曹操助他圍布於下邳，生擒呂布，將被擄的妻子還給他，給他升了官，做起左將軍，待之厚禮，「坐則同席，出則同車」，其時袁術從下邳過，曹操遣劉備出而要擊

，曹操的謀臣程昱，郭嘉說：「劉備不可縱。」實在劉備當時就已和董承密謀反對曹操，這是第二個反覆。等到給曹操打敗，投歸袁紹，紹遣人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紹父子傾心敬重」，但後來他所亡失的隊伍逐漸集合之後，他又「陰欲離紹」了。這是第三個反覆。到了荊州，劉表「以上賓之禮待之，益其兵」。但劉備終於據了荊州，喧賓奪主，這是第四個反覆。後入益州，劉璋「自出迎相見甚歡」而又反劉璋，奪益州，這是第五個反覆。

但從政治鬥爭上說，劉備的忘恩負義，反覆無常，並不成爲一種罪過，這種利害的結合和分離，正是理所必然，勢所必至，我們不能以此爲劉備病，因此也就不能以此去詬責曹操。

我總覺得，劉備有劉備的可愛處，曹操也有曹操的可愛處。劉備的兩點特長，是知人善任，與愛護部下。曹操的兩點特長，是機智有爲與雄才大略。

劉備的信任諸葛亮，並且付以大權，這是有知人之明，而又有善用之量。劉巴是一位才智之士，但甚驕矜，當劉備奔江南之際，荆楚之士從之如雲，但劉巴不大看得起劉

備，却跑到曹操那裏做官，劉備采以爲恨。後來劉備定荊州，巴從交趾到蜀，劉備仍然重用他。說：「子初才智過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繼任也」，這也是愛才知人之證。他的知人較孔明還要眼高一着。馬謖街亭之失，孔明還沒有看透馬謖只是軍事理論家，而不能做行軍的將帥，所以貿然叫他統率大衆作前鋒部隊，結果給張郃殺個大敗，士卒離散，使軍事大計受極大影響。但劉備老早就看透了馬謖的短處，他知道孔明很愛重他，臨薨時就提醒孔明，說：「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大概馬謖才器過人，喜論軍計，理論方面頗有獨到之處，所以連孔明也「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極爲推崇，而劉備批評他「言過其實」，叫孔明不宜大用，早就發現他的短處，凡此知人之明，和漢高祖差不多。其愛護部下，已見前例。不贅。

至於曹操，他的聰明，能幹，和瀟灑恢宏的風度，也是可愛的。在戲臺上，我們常把曹操變成大花臉，一副醜相，其實，他決不是一個可憎的人物。他雖是政治家，却有點書生氣。魏書說他「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而「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來得何等瀟灑，至於橫槊賦詩，豪情逸興可想。魏書又說他

：「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煖，無有緣飾」。這雖不可盡信，但曹操因為頗好風雅，不尚奢侈自娛，想是實情。一般人又以爲曹操性近酷虐，馭下寡恩，這也并不盡然，會有他一道令旨，對出征軍人家屬頗示憐恤說：「自項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這雖可說是收買民心的一種技倆，但用現代名詞說，總算得是「優待出征軍人家屬」了。還有，他雖在戎馬倥傯之中，却還關心到教育，他有一道令旨說：「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優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這也是由於他是讀書人出身之故。

總之，劉曹各有所長，動名事業，固已各傳千古。我們客觀批評，劉備沒有如演義裏所描寫的是那麼一種完人，曹操也沒有如演義裏所描寫的那麼一種奸賊。

### 三 論孫吳

三國之中，孫吳的聲勢來得較差。既要對蜀保持聯絡，又不能不對魏屈服，曹丕稱帝，孫權還是稱臣，登位改元，是最後的一個，論地盤，江東之地較魏雖不如，較蜀却要好；論人才也并不弱於魏蜀兩國，何以吳孫的聲勢終究來得較差？此無他，政治的號召不夠。

政治的號召，現代我們要標出什麼「主義」，從前却是談傳統，陳涉起兵，要先製造些狐暉故事，陰陽家織緯五行之說，也是一種政治號召的技術。在三國當時，「漢賊不兩立」，是蜀漢的鮮明政治號召，昭烈是以帝裔自居，號令天下的，曹操雖不性劉，他的腋下却夾住一個真皇帝，挾天子自重，有所憑藉，東吳既不能以帝裔爲名，又不能挾帝爲令，師出無名，號召無據，這是大大的吃虧處。

東吳的政治人才，不能編造出一些可以號召的政治口號或騷人故事之類，未免都不

高明，但大概在當時，頗不易製造，也就祇有納悶地等於消聲下氣。智勇兼備的孫策，畢竟是一個聰明人，他是老早就想到這一個重大關鍵的。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紹相拒於官渡，那時孫策正在準備乘曹操外出之際，「襲許迎漢帝」；所謂「迎」，實在就是「搶」。孫策這一著是表現出他的雄才大略處，可惜，事情沒有成功，當他正在部署待動的時候，他被吳郡太守許貢手下的幾個無名小卒暗殺斃命了。假使孫策當時不死，以他英勇果敢的本領，或者可能襲取成功，那位漢帝搶到江東，局面也就不問，招牌一掛，號令就可以大模大樣了。

東吳失去這一個絕好的機會，以後政治上便能「破」而不能「立」，能「守」而不能「攻」，到了孫權，才氣不如孫策，保守祖宗這一份遺業，也就有點戰戰兢兢。孫策臨死時曾經對孫權說：「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這已經說明東吳以後的命運，終於連江東也不能保，從武功而論，我覺得孫權是不及孫策，從魄力和眼光而論，我更覺得孫權是不及孫策，陳壽之評孫權，是：「屈身忍辱，任才當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然而

終於是屈身忍辱，不設法打開僵局，不設法擴大政治號召，不從政治攻勢着想，不進即退，終於株守待亡，究非雄才大略人物，孫策死時，年才二十六歲，這是東吳一大損失，孫策倘不早死，或者不祇「有守」也許還可「有爲」。孫權由於不能提出政治口號，直到他登位，祇能編造些「夏口武昌，并有黃龍鳳凰見」的庸俗故事，他的登位告天文是說：「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厯數在躬，不得不受，」（見吳錄）說得并不漂亮。

其次我總覺得吳孫的人主，總是帶有執袴的氣質，從孫堅到孫皓，都是偏激輕躁的作風，孫權算是最穩重的一個，但他的公子哥兒脾氣也仍然濃厚，無端廢黜太子，三番四次的立嗣，也屬於輕躁的作風，孫堅，孫策，大都年少氣盛，驕矜自負，而孫策對於人才，頗不能優禮，吳錄曾有一段記載，說及孫策殺一隱士事，據載當時有高岱其人，隱於餘姚，孫策想叫他出來，知道他精於左傳，自己預先涉獵，準備和他談談，左右有一位什麼人對孫策說，高岱祇把將軍作爲一個武人罷了，文學是不懂的，倘若你問他左傳裏的事，有時不答覆，他就是輕視你。隨後又去告訴高岱說，孫將軍好勝，不好遇問

必答，如果辨義太清，恐有危險。高岱果然不盡答覆，孫策以爲輕己，一怒之下，便送他坐牢。大概這位高岱，真的名望極好，許多時人和他的知交都露坐請求釋放，人數填滿數里，孫策更恨他「能得人望」，索性把他殺掉，從這個故事看來，孫策的驕於偏激，不能禮賢，并且忌才，可見一斑，孫權雖能任賢選能，但較之劉備的三顧草廬風度，似乎還差一着咧。

最大的一個原因，使孫吳始終陷於守勢，無法向外伸展的，便是邊境的民族爲患，受着大大的牽制。我們不要忽略，在當時的魏、蜀、吳、三國，都有邊區的民族時時作亂。魏國邊患的民族是，烏桓、鮮卑、即所謂東胡。蜀邊患的民族是南方滇黔的苗夷，東吳邊患的民族是武陵蠻，是山越。這些邊區民族的擾患，是當時三國的內在之憂，他們要逐鹿中原，要統一大局，必須先對邊區的異族加以剿撫，使無後顧之患。所以大家安內政策，首先要顧到邊患的平削。魏國的烏桓、鮮卑，在漢末大亂時，佔漢南一帶，時時蠢動，曹操在追擊袁尚時，便用兵烏桓，肅清北邊之患，徙烏丸之衆數萬到中國內地，參與兵役，用的是徙撫策略。蜀國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率大軍平定南



中，對孟獲七縱七擒，使「南人不復反」，然後才專意北伐。東吳的武陵蠻，山越，屢剿屢起，終東吳之局，時時作亂，難以平戩，東吳所消耗於應付這些邊患的人力物力不可勝計，因此牽掣甚大。

丹陽一地，在當時吳國就是鄰接山越民族的一個要衝，做丹陽太守的人，簡直全副精神就在對付山越。諸葛瑾的兒子諸葛恪，軍功甚盛，名噪一時，也就是因為他做丹陽太守，平山越有功，曾經封做威北將軍。這種邊區民族，確是使東吳感到頭痛，大概丹陽、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各地山谷萬重，都是山越的盤據地，因為他們有險可恃，相時而動，很難給它一鼓盪平。史裏描寫他們是：「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吳志「諸葛恪」傳裏說：「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升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有時，也就要對他們有所顧忌，有所遷就，吳志「賀齊傳」有這麼一段話：「少爲郡吏，守刻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

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可見山越的梟張。還有武陵蠻也時時蠢動，太常潘濬有一次會率衆五萬人討武陵蠻夷，費了很大氣力，才平定一時。其間屢屢爲禍，史不絕書。

這種邊民的爲患，也并非完全是一種樸素的山野民族的蠢動，其中，也帶有政治的意味，就是各國對本國以外的民族，多暗中勾結，煽動作亂，以收牽掣敵國之效，這樣對國土以內的邊民，極力剿撫，而對別國的邊民則惟恐其不亂。我們試看下面的事實：

「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煽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友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陸遜傳）

「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孫權傳）

「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北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漢晉春秋）

僅僅摘錄這幾段事實，就可說明各國都在利用對方的邊民，作爲內應，而曹操對於山越的鼓煽，暗中派遣奸細深入活動，史中不難尋出許多線索，并且這種計策，顯見大效。但東吳利用敵國的異族這一種事實却很少，這雖是由於地理環境上的關係，但當時

似乎沒有什麼人提過這種「以牙還牙」的主張，或者既認定祇取守勢，附魏和蜀，也就不作各方面的進取。不過這種吃虧的地方很大。陸遜初出的時候，便對孫權說：「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這可謂洞悉時弊，切中肯綮，東吳的心腹之患，正在於此，而不能「圖遠」者，也正在於此。

其實，東吳的局面，能夠「守」，似乎也就不容易，它沒有鮮明的政治旗幟可以號召，守局也就覺得心滿意足，而守局的形成，全仗周瑜擊破曹軍水師數十萬，火燒赤壁那一役。赤壁一役的決戰，可說是撐起了東吳，成爲鼎之一足，那是決定東吳命運的一個大關鍵。假如沒有孫權的決心，沒有魯肅周瑜的極力主戰，并且獲勝，轉移艱危的局勢，東吳早就成了曹操的附庸，威逼，蠶蝕，必不能撐持以後獨當一面的局面。

我們試看當日東吳的情形，實在頗難應付。曹操入荊州，劉琮將水軍船隻步兵，一古腦雙手奉上，曹操乘勢威臨江東，號稱數十萬，東吳在這大軍壓境的嚴重情況之下，「和」與「戰」，就成爲二者必須擇一的迫切問題。「和」簡直就是降，降了便永遠不能抬起頭來，而「戰」，以東吳的力量，實在太衆寡懸殊，取勝毫無把握，於是籌劃對

策之中，便顯然分出「主和」「主戰」兩派，主和派是穩重老成的張昭等，大概大多數的人都附和他。主戰派則以魯肅，周瑜爲首，但附和的很少。張昭一派對局勢的分析是：「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艦燻鬥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立，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前半段是從政治方面估計敵人的力量，後半段是從軍事方面估計敵人的力量，於是結論便是「無抵抗」的迎降。主戰派的主張却不同。魯肅對孫權說：「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以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周瑜更進一步分析局勢，和判斷敵情。他以爲：（一）曹操北土未安，馬超韓遂等尙在關西，顯然有後顧之憂，不能與我作持久戰。（二）海戰非中原士衆所長。（三）天氣嚴寒，曹軍發動「冬季攻勢」，遠涉江湖，馬無糧草，士兵水土不服，必生疾病。（四）曹軍雖號稱七

八十萬，但實在的軍力，劉表不過七八萬，魏軍不過十、六七萬，合計祇有二三十萬人，不能把曹軍力量估計得太高。他批評主和派的意見，說：「諸人徒見換書，言水步八十八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主和的人，大概也真是懼於曹操的「哀的美敦」書，懼於曹操的「神經戰」，所以造成一種卑怯心理，而周瑜魯肅，却獨排衆議，積極主戰。打破他們的消極悲觀的論調。

孫權呢？他也是主戰的，這也就是孫權之所以爲英雄，不同於劉琮一流的所在。他不能無抵抗的受屈於人，他要保持獨立的局面，他要抗戰。他對周瑜說：「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當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於是他決定了拒戰國策。「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江表傳）

但當時衆寡懸殊之勢也確是實情，就算曹操東下之衆不過二三十萬，但東吳可調動的部隊，要湊足五萬人還成問題。周瑜請兵五萬，孫權對瑜說：「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周瑜便祇領了三萬人去抗數十萬的曹軍，結果憑着「勇氣」與「決心」，打

了大大的勝仗，挽回東吳的危局，這是周瑜不朽的大功，而最早主戰的魯肅，（周瑜也還是魯肅勸孫權從鄱陽召回共商拒戰大計的）并作外交上的活動，與劉備訂下同盟。軍事外交並進，我以為功勞比周瑜更大。這一決策，奠定了建立東吳的基礎，我們現在翻看這段歷史，覺得那一幕正是東吳的生死關頭，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假如當時降迎曹操，三國的歷史，便不能是這般面目。

然而，東吳的局面雖撐持起來，以後的政略却犯了很大的錯誤，就是對蜀漢的聯盟政策沒有做好，予魏國各個擊破的機會，而最大一次的錯誤，是呂蒙襲殺關羽，佔據江陵那一役，因此傷了蜀漢的感情，使劉備興動大軍，釀成蜀吳大戰之局，雖然陸遜打了一個勝仗，但從政略來說，一誤再誤，雙方作消耗戰，實與東吳本身不利。因為當時天下三分之局，以魏為最強，魏是吳蜀的主要敵人，吳蜀必須聯盟，共同應付當前的主敵才能自守。東吳的國策，始終都是守，既是守就當聯蜀，不當攻蜀。削弱蜀的力量，無異使魏坐大，魏的力量坐大，對於東吳是增加威脅的。呂蒙的襲殺關羽，陸遜的擊敗劉備，從整個戰局來看，祇於魏有利，而於吳沒有好處。

曹操的政治運用畢竟是手段高強，那一次顯然他是用了反間之計，并且對孫權施以利誘而使吳蜀火拚的，且看事實：「關羽威震華夏時，司馬宣王蔣濟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襲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於是孫權陰誘芳仁，等到關羽出師歸來，呂蒙已據江陵，從此魏方「議徙許都」受關羽威脅的形勢就跟着轉變了，鵲蚌相持，得利的却是漁翁。

孫權一面忌關羽的勢力，一面禁不起曹操的利誘，政治眼光是短小的。呂蒙主張襲殺關羽，固然賣了大氣力，但他根本是一個老粗，他的襲羽成功，自以為武功昭著，其實貽害了大局。東吳了解「吳蜀同盟」的重要性的，祇有魯肅一個人，（蜀漢定下聯吳政策的是諸葛亮，東吳主張聯蜀的是魯肅。）呂蒙傳載：「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可見魯肅并不同意在那時就去消滅關羽，打擊蜀漢的勢力，使吳蜀邦交陷於決裂，但孫權的為利所動，呂蒙的急切喜功，終於撕毀吳蜀的盟約使曹操得以從容轉移局勢，這不能不說是孫吳政路上的一個大失敗。

#### 四 論魯肅

一  
三國人才中，魯肅是個極可愛的人物，至少我對他有甚深的偏愛。

他有眼光，有懷抱，有修養，有丰度。他懂得政治，懂得軍事，懂得外交，而忠、勇、智、儉的美德，他樣樣具備，幾乎沒有什麼缺點使人可以批評，使人覺得缺憾的，只是他四十六歲的早死，孫吳人才的第一把交椅，除了他，我以為是沒有人可以毫無愧色的坐上去的。

他的才能的某一方面，東吳人才羣中會找到比他更優秀的人，但他們僅僅是抱一技之長，能夠像他這樣全能的「通才」我們怕舉不出第二個。而尤其是他的政治眼光和外交見解，較其他的「濟濟多士」確乎高超一着。

二



以當時的形勢而論，魏的力量比蜀吳都強。蜀吳的策略，不能不結盟對魏，所以蜀漢的外交，必須「聯吳」，而東吳的外交，也必須「聯蜀」。諸葛亮出山的第一策，就是「據蜀聯吳」，這是他的卓識，但具有這種外交見解的人，蜀漢沒有幾個，劉備自己就是完全漠視這種外交運用的人，一個衝動，他就破壞了這種策略，東吳方面，主張「聯蜀外交」的，也只有魯肅一人，別個也不甚注重，如張子布之流甚至是主張聯魏的。諸葛亮和魯肅，在這種外交見解上，可說英雄之見略同。我們知道魯肅死時，諸葛亮也爲他發喪，這對他人絕無其例，爲什麼諸葛亮那樣尊重他？並非由於他們的私誼，而是將魯肅作爲蜀漢的一位親擊的朋友，因爲魯肅是盡力於蜀吳的和平邦交的。

當昭烈初爲曹操戰敗，狼狽奔到夏口的時候，魯肅就和昭烈拉攏了。他對昭烈說：「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吳，崇德和之好，共濟世業」（江表傳）其後諸葛亮便隨魯肅會晤孫權，訂下同盟之局。又史載：

「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共拒曹公」。（魯肅傳）。

「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漢晉春秋）

從上面兩段歷史所說，劉備的借得荊州，還是魯肅在孫權旁邊慫恿的，所以後來孫權批評魯肅曰：「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呂蒙傳）但魯肅並非有所偏私，他是忠於體國的，他的政策是要「共拒曹公」，「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這種策略，絕對正確，（「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筆落於地。」）假若當日不予劉備建立勢力的地盤，多操之敵，東吳也許不能撐持如此之久。及後，蜀吳爭長沙零桂三郡一幕，魯肅和關羽陳兵相對，也極力運用和平的干涉。

「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魯肅傳）

「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

，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魯肅傳）。

「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回爲老，將何獲濟，羽不能答」（吳書）

於此，我們想見魯肅的應付仍是要避免武力的決鬥；本來，借荊州是他慫恿孫權的，但等到劉備勢大，關羽「威震華夏」，魯肅却要奉命爭回三郡，這種局面，本來頗不容易應付，而且對方的關羽，是一個驕矜的「老粗」。但魯肅一方面實力相向，一方面仍運用外交手腕，雙管齊下，卒能完全解決，「割湘水爲界」，維持聯蜀的政策而爭回領土，不辱君命，這種任務，其他任何一個人是難以完成的。

可惜的是，呂蒙一手破壞了魯肅的聯蜀外交政策，撲滅關羽，襲彭襄陽。蒙對孫權說：「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顛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呂蒙是一個急功好勇的軍人，自然不懂得大局的利害。但魯肅是始終反對的：「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助，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呂蒙傳）魯肅知道主要的敵人是誰

，所以他斤斤主張不能和蜀破裂。

### 三

東吳在一個時期中，碰到了一個嚴重的危難關頭，那就是曹操打败了劉表，併了劉琮全部的海軍，挾數十萬大軍乘勢東下向東吳威脅的時候。曹操當時曾向孫權下了哀的美敦書：「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江表傳）在那樣的形勢下，東吳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迎降，一是抵抗，滿朝文武，大多數是主張迎降曹操的，只有魯肅獨排衆議，主張抵抗，假如沒有魯肅，東吳那一次就會不能翻身，以後的基礎便難以建立，魯肅挽救東吳命運之功，正和諸葛亮挽救蜀漢命運之功一樣大。

且看他抨擊主和派張昭等的論調：「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轎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他知道假如迎降曹操，東吳將永受曹操威脅，不

能翻身，必須抵抗才能圖存，其見解較之甘於苟安，抱悲觀儒怯心理的羣臣不可同日而語。

其後周瑜的領軍抗戰，也是出於他的獻議，史載「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劃方略。」周瑜從鄱陽調回，曾對孫權說了一番「抗戰必勝」的道理，並判斷敵情，認爲敵不足畏。這番話也顯然是魯肅和他商議好的，而他在軍事上「助畫方略」，以寡敵衆，擊潰曹軍數十萬大軍，軍事才能，也具見優越。

周瑜臨死的時候，曾舉魯肅以自代。他說：「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又說：「魯肅忠烈，臨事不苟」，這都是恰當的贊語。

東吳的人才，是頗缺少遠大的政治眼光的，魯肅第一次晉見孫權，孫權問他：「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本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但魯肅的答語，却表現了他遠大的政治眼光：「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這番話說得何等有魄力，有眼光，當時東吳沒有一個人能向孫權作這樣「雄圖大略」的計劃的。庸碌平凡的張昭自然覺得這是「大言」，批評他「年少纒疏不可用」。但這正是顯出魯肅政治頭腦的超卓，如果說諸葛亮是爲蜀漢撐起三分之局的大功臣，魯肅無疑也是爲東吳撐起三分之局的要角，魯肅的建議，也就和諸葛亮的「隆中對」一樣口吻，一樣規模，王佐之才，堪以并稱。孫權卽帝位時，「願諱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又說：「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孫權的帝王雄心，魯肅有以促成，可以想見。

## 五 論司馬懿

曹魏費了幾十年的苦功和苦心，克服了許多軍事和政治上的困難，才篡得漢家的天下，但司馬懿沒有費多大的力量和時間，很輕巧地就把曹家的天下掌握到自己手上來了，曹操的創業是英雄造時勢，司馬懿的成就，却是時勢造英雄。

何以說是時勢造英雄？第一，那時的時勢，有可以使司馬懿攫取大權野心的機會。這種機會是魏主叡給予司馬懿的。魏主叡病篤的時候，本來想叫燕王做大將軍，加上夏侯獻、曹爽、懿肇、秦朗等諸人共同輔弼齊王，但却決定不了，終於相信劉放、孫資的獻策，把誠實穩重的燕王不用，改用了曹爽做大將軍，劉放、孫資又一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網維皇室，雖經曹肇等一度的阻撓，最後還是叫曹爽和司馬懿「登牀，受詔」，共輔幼主，魏室的亡，就是這一個關鍵。劉孫的獻策，在道理上似乎想得很周到，因為曹爽是宗室，司馬懿是功臣，他們共同輔政，可以彼此牽制，建立二元的兩頭政治

，不致大權偏重一人，殊不知這就是釀亂之階，培養了司馬懿攫取大權的野心，給他召致了本來不必敢想的慾望。他取得了這一個可以滋長慾望野心的地位和時勢，幹嗎不想做做天字第一號的人！而這種時勢、機會，並不是司馬懿自己去創造的，却是曹叡自己給予他的。司馬懿那時雖然有平遼東，却諸葛亮軍的勳勞，但也不過建立「關外」之功，倘若不引之入內廷，登牀受詔，覬覦之心，未必由起。而搭檔的曹爽，又是那麼一位粗心暴氣的傢伙，自然更不在司馬懿眼內，果然不多久就剪除了。總之，那種時勢都是很便利於司馬懿的，因時順勢，司馬懿輕輕巧巧就獲得好機會。

第二。曹操的篡漢，是以權術取天下，也是以權術治天下，在漢末法紀弛衰，羣雄並起，人心思亂，曹操既取得大權，曹操不能不用重典來鎮服人心，所以其治國也用嚴刑酷法。把老百姓喘不過氣來。再加之以連年戰爭，人力財力，不斷消耗，人民苦於徭役課稅，沒有得到一天安樂日子，司馬懿執政後，那時吳蜀勢力已弱，他在政治上換了一套假仁假義的作風，一切都從寬大處置，人心在極度疲乏之後，就使他這種政治作風，在那時勢中得到老百姓的愛戴，所謂「亂極思靜」，環境已經要求他造成一個統一局



面的輪廓，他便因此成了統一三國的英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裏有一段很透闢的評斷，也是這種見解的，他說：「懿氏之毆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寬，先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漢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思之姿，懲漢失而以申韓之法鉗網天下，崔琰、毛玠、鍾繇、陳羣、爭附之，以峻峭勝迫相尙，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亟興，而無敢爲荏葦之寇，乃蘊怒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游卒歲也，其情亟矣。司馬懿執政，而用賢恤民，務從寬大，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措紳以迄編氓，乃知有生人之樂，處空谷者，聞人聲而輒然，樂盈之汰，人且歌泣，以願爲之死，况懿父子之謀險而立惠已周也乎！」這就是時勢把司馬懿造成了統一大局的英雄。

以軍事才能而論，司馬懿比不上曹操，更遠不如諸葛亮，但因爲他是一個時代的幸運兒，因此他在軍事上很少吃敗仗，後人都把他的才能估量得太過高了一點。有許多事實，都是幸運使他成功的，譬如抵拒諸葛亮相出兵斜谷的時候，他原本是想由主力和諸葛

亮決一雌雄的，後來按兵不動，爲困敵的方法以老敵人之師，就并不是他的戰略，這是由孫資老早所決定而最高統帥部魏主叡命令他如此做的。魏志裴注引「孫資別傳」說：「諸葛亮出征南鄭，時議者以爲可因大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將士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中國日盛，吳蜀兩虜必自罷弊。」這是孫資老早供獻的戰略。

魏志明帝紀又載：「諸葛亮出兵斜谷，屯魏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這是明帝叡根據孫資決策指示他戰略的命令。

裴注引「魏氏春秋」載：「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勅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

這可見司馬懿原本是忍受不住挑戰，也要出戰的，幸虧辛毗仗節奉詔制止，他老人家才不敢抗命，終於使諸葛亮憂困以死，這並不是出於司馬懿的軍路和戰功，却是由於孫資戰路的指導原則和命令的制止，要是他一出戰，準會吃個大敗仗呢。

但是雖則如此，他在曹操諸葛亮死了之後，却不能不說是一位政治軍事都無抗手的人，那時的人材太寥落了，因此他成爲一個傑出的一時無雙的人材。

平遼東，是奠定司馬懿後來成就的一個大關鍵，也是魏主叡信用他的開始。

那時公孫淵在遼東是邊防的大患。魏帝要司馬懿率衆遠征，用兵四五萬人，道路四五千里，大概羣臣都表示憂慮反對，以爲勞師遠征，役費給養會發生困難，就是征討，也似乎不必用那麼多兵。魏帝問司馬懿往還要多少日子？公孫淵會怎樣應付？他的心裏也很焦慮司馬懿是否會有把握。但司馬懿作很決定的答覆，說：「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並且他以爲公孫淵無非有三策可行，棄城預走是上策，據遼水迎戰是中策，坐守襄平被擒是下策。但公孫淵不是有智謀的人，斷定他必先出兵遼水迎戰然後退守，那末，便可以剿平。結果，他的預料沒有失敗。這

自然使魏帝滿心歡喜，寵信有加。他率兵到滄東時，還遇到一點波折，就是遇着連天大雨，不便大舉進攻，耽擱了一些日子，朝廷裏面反對出兵的人又在那裏議論，要請皇帝詔回，但他始終是幸運的，皇帝極力支持他，說：「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而待。」他終於唱着凱歌來答復了那些表示懷疑和反對的人。我們假使這一次出兵，司馬懿吃了敗仗，他的功業是從此休矣，因為這一次出兵，魏帝也遭受羣臣的非難，變成魏帝和司馬懿是主張出兵的，其他的人是不主張出兵的，以此，司馬懿誇下大口，魏帝極力捧場，倘若失敗，不獨司馬懿聲威掃地，就是皇帝也沒有面子，司馬懿準會貶謫不能翻身；相反，他的克奏全功，就使他的威望大增，取得信任，奠定後來地位發展的基礎。他自然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機智而又具有忍耐力。機智不難，具忍耐力最難，他的政治上的成功，第一是時勢，第二也靠他一點聰明和沉潛的忍耐力。

他\知道曹操的才略和多疑心，在曹操活着的時候，他是甯可少說話，少賣大本領的；曹操聽說他有「狼頭」之相，走起路來時時回頭，并且身子不動，曾經當面測量過他，後來曹操對他的兒子曹丕說：「懿非人臣也，必預備家事」。可見曹操早就對他注

意。但司馬懿畢竟用他的過人的忍耐性，極力沉潛着，後來不僅使曹丕對他不害怕，并且重用他，及至和曹爽同受魏王詔命輔助幼主，曹爽以皇親國戚的關係，又聽了何晏、鄧襲、李勝諸人的讒言，便獨攬大權，處處防備司馬懿，選他做太傅。司馬懿一概容忍，甚至詐病休養，故意避讓。曹爽還是不放心。有一次，那位曹爽的心腹李勝到荊州去，便道向司馬懿辭行，並且窺伺一下他的舉動，司馬懿便裝起老病來，叫兩個丫頭在傍服侍他，穿衣服也屢次脫落，吃粥多從嘴角流出了，沾滿前襟。李勝看見也覺得可憐，爲之涕泣，說：「大家以爲你老人家舊風病發作，那料貴體竟然病到這般模樣！司馬懿還呢喃地有氣沒力的答道，「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又故意將本州說作并州，李勝三番兩次說是本州，并非并州，他却一味裝糊塗昏亂，李勝竟以爲他真是神志不清，向曹爽說：那老糊塗指南爲北，言語不清，怕活不成了。那知司馬懿相反的是神志清明，等到他佈置局勢已成，便換了皇太后的命令，引兵相向。使曹爽不加提防措手不及就給他殺掉了。這就是他機智和具忍耐力的地方。

並且他雖則是一手把攬着曹魏江山，開創了晉朝天下，但他自己却還忍耐着沒有

真正登上九五之尊的龍座，僅是和曹操的做法一樣居承相之位，加九錫，朝會不拜而已。

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司馬懿的取曹魏的江山，也許不是蓄意深謀，一則是曹爽的傾軋，司馬懿不得不取防的態度，由防守而曹爽還要再進一步進攻；司馬懿就不能不採取反攻了，並且曹爽的野心，是顯然有「謀圖危社稷」（晉書）的陰謀的，丁謐，何晏，畢軌，桓範等和曹爽的幾個胞弟，都是擁戴曹爽，陰圖帝位的人，一幫頭，就由丁謐設計，使曹爽的弟弟曹芳上表，奏請轉司馬懿做太傅，太傅的地位固然較原來的太尉名位為高，但實則明升暗降，剝削其軍爭權。其次就佈置他的幾個弟弟都做了皇帝的親隨侍班，魏志曹爽傳載：「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倚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他的胆大妄為，也可想見；後來他的黨羽張當也被捕下獄供出：「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爽有皇帝的野心，似乎不可否認。

二則是曹爽翦除以後，他不能不獨自担起大責，事實上就成了那時的主宰者，然而司馬懿算是謙遜的，他大權獨攬，不但沒有立刻就想做皇帝，並且常常告誡他的兒子說：「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尚有推移，吾德何以當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這雖是一派虛僞的話，較之曹操的「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的氣派，却謙虛得多。在三國當時那種變亂的局面中，本來誰有力量，誰就可毫不客氣的登上帝座，況且曹家的天下也是篡漢而來，本非正統，倘若司馬懿想過過皇帝的癮，何嘗不可做一幕受禪的把戲，但他活到七十三歲，也還甘寂寞，屢辭承相職，司馬師承他父親的餘蔭，雖然玩弄了一齣廢立魏帝的喜劇，因為死得太早，皇帝也沒有做成，司馬昭「路人皆見」之心，固然慾望較之乃父乃兄爲大，但要不是魏帝豈不甘做傀儡，說出「吾不能坐受廢辱」，並且過於輕率，親自帶了自己的衛隊去攻司馬昭，司馬昭也還不致於敢殺他，後來司馬炎做了皇帝，司馬懿才變成開國的祖宗，這是他躺在墓中無從知道的事情。其實他是三國裏面的人物，但現在三國誌裏是沒有他的傳記的，因為他孫子的關係，他才變成晉宣帝罷了。

平心而論，司馬懿還不能算是什麼奸，他和曹操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曹操因為時勢環繞還不許可他登上帝座，但心裏倒有點癢癢的；司馬懿在曹爽被誅之後，齊王芳年輕昏昧，耽於逸樂，時勢環境很可能使司馬懿黃袍加身，而他不但沒有作如此想，并且連丞相還極力謙辭。裴注引孔衍漢魏春秋說：「詔使太常王肅冊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後來加以九錫之禮，他還是謙辭，他說：「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也不肯接受。這種作風，恐怕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的實行，並非全出於虛僞吧。

總觀，司馬懿的一生，他是一個穩重，機智而宅心尚不失爲忠厚的一個時代幸運兒。



## 六 論關羽

關羽在蜀漢的歷史上，固然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說是一個出色的人物；他曾經以他的威武，幾乎逼使曹操遷都，十餘年打江山的血戰中，他立了很大的軍功，然而他的功績，無論如何也夠不上後人對他那樣尊崇膜拜的程度，民間一般人對於關羽崇拜，較之諸葛亮顯然還有過之，市井社會中關羽的圖像到處供奉，他已經成爲民間的偶像，一位神，一位地位超逾其他神的神。這種原因，大概是第一，由於三國演義的影響，第二，清代對於關羽的有意尊崇。三國演義一書，雖是小說家言，——三分歷史七分杜撰的通俗演義小說，但它成爲民間的主要讀物，獲得社會大眾的愛好，其中關於關羽的描寫，個性很是深刻，渲染也極生動，因此關羽這個人物，就使大眾都敬愛而崇拜，至於有清一代，對關羽曾經加以封諡，甚至通令立廟，這種推崇，屢見之於清世祖，乾隆帝的諭旨，清世祖初降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乾隆於三十二年又降旨加靈佑二字。清廷

這種舉動，是頗有政治意味的。因為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在清初，明室孤臣孽子，避時時懷着一腔忠忱，企圖光復河山，這種精神是對漢族的一個「忠」字，有清統治者想轉移人民大眾的目標，便有意另外抬出一個「義」字，以變換人心；關羽的事蹟與傳說的故事，恰恰是重在「義」字的，譬如「桃園結義」，「華容道」等故事和傳說，都是講義氣的，因此抬出關羽來作民衆的偶像，我們知道一般社會大眾對歷史上的人物，普遍地崇拜的是岳飛和關羽，岳飛是「忠」的代表，關羽是「義」的代表，在清代以前，恐怕大眾尊崇岳飛當過於關羽，有清統治者自然不願意大眾增高崇拜岳飛的情緒，以引起忠君愛國的民族思想，所以極力推崇關羽，這樣一來，關羽果然在市井江湖間成爲大眾所最膜拜的偶像。

若從歷史上去認識關羽，據三國誌所記載，關羽不過僅是一個勇而無謀的軍人，就是陳壽的批評也是和張飛並稱，說他們：「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并不怎樣讚美。

論武勇，不見得會比張飛、黃忠強，論韜略，似乎還不如趙雲、馬超。而政治頭腦

更遠不逮趙雲。

批評關羽「剛而自矜」是很恰當的；譬如他的「刮骨去毒，臂血流離而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就充份表現出這種個性，又如：孫權會遣使要和關羽對親家，關羽竟罵起來說，虎女那能配犬子，他的一副剛愎跋扈的神氣，決不如現在所畫的關公像那麼儒雅。

說起他在蜀漢的功勞固然很大，但說起過失，他却也不小。他和東吳不合作，不懂得政治，以致破壞了蜀吳的邦交，使曹魏得以各個擊破，是蜀漢成敗的一個最緊要的關鍵。他打敗曹將于禁，威震華夏，那時如果取得孫吳的合作，依照諸葛亮的聯吳政策，蜀漢的局勢是很可能急轉直下發展的，可是關羽相反地和東吳齟齬起來，便使曹操司馬懿得以用離間之計，利誘孫權，結果，兵敗被殺，形勢反爲之一變。跟着劉備的出師復仇，大軍覆沒，身死白帝城，國勢由極盛而變極弱，一落千丈，終使諸葛亮鞠躬盡瘁，也無從振起，此中根本所繫，就在關羽一人！

關羽真是一個不懂得政治的軍人。但他却是劉備的親信，他們有深切的歷史關係，

「恩若兄弟」，這種歷史關係，使諸葛亮也不能不遷就他，因此他在當時是很有權勢的。劉備對諸葛亮固然尊敬，但對關羽也顯然信任，而這種信任，不僅是對於一個將官的信任，這裏面，還表示了絕對的親切的對嫡派幹部的愛。因此諸葛亮和關羽之間，在他們的個性、地位、和他們的各自認識上，各自所負的責任上，不能不有了差別。以「恩若兄弟」的對劉備的關係，再加以個性倔強，關羽的驕矜是可以想見的；諸葛亮爲大局籌謀，苦心策劃，但不能不遷就關羽幾分。當時諸葛亮的委曲求全，在歷史記載上現在已經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但從馬超來降，諸葛亮致書關羽，一面解釋，一面恭維，說：「孟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然猶未及髻之絕倫逸羣也」這一點事蹟來看，諸葛亮對關羽是有遷就的苦衷的。

不僅諸葛亮對關羽遷就，就連力主聯蜀的東吳魯肅，也曾爲了吳蜀外交關係，遷就過關羽，當魯肅和關羽兩軍鄰界相守時，關羽「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爲什麼魯肅也要遷就他？因爲魯肅也和諸葛亮一樣，主張吳蜀聯盟共拒曹魏的，關羽不懂天下大局形勢，魯肅諸葛亮却要顧慮到大局。關羽的勇武剛直，固然使人可敬，

但其簡單無知的頭腦，却也使人可惜。

從許多事實看，似乎關羽對於東吳的敵意還甚於對魏曹。他恨孫權，並且瞧不起他，叫他「猪子」。曹操對於他却有過一點感情，那年劉備奔袁紹，曹操活捉了關羽，不特沒有害他，還拜他做偏將軍，禮待很厚，後來雖明知他決不肯留，也還重加賞賜，任他歸附劉備。這點恐怕也是關羽并不怎樣恨曹操，反而覺得孫權才是主敵的一種情感因素。演義上「華容道」的許多穿插，自然不全是事實，但情感上的作用，再加簡單的頭腦，關羽對曹操的看法和對孫權的看法，一定會是兩樣的。問題就出在這一點小破綻上，終於關羽雖然威震華夏，但曹操不但沒有遷都，一個離間計，關羽就喪命在孫權的手上，連妻子也一齊犧牲了。

在三國人物中，有一個人和關羽頗可比擬並論的就是東吳的呂蒙。

呂蒙的地位，在後人看起來，自然比關羽差很多，但他在東吳的成就，却比關羽爲大，我覺得呂蒙一生前半截的爲人。頗和關羽相像，呂蒙也是老粗出身，饒有胆勇，他在東吳，也和關羽在蜀一樣，祇知忠於主子，勇於殺敵，却不懂得政治，不懂得時勢，

分不清那方面才是主敵，所以關羽一味和東吳作對，呂蒙也一味和蜀漢作對，終於關羽也喪在呂蒙之手。呂蒙的個性，起初也是很倔強驕矜，頗爲自大。但後來呂蒙却一變而爲勇而有謀的人，他的修養天天進步，追求學問也日有進境，居然成爲一個勇智兼備，才略過人的人。孫權勸他讀書、求知，他就「篤志不倦」，吳志引江表傳：說他：「其所覽見，舊儒不勝。」他的刻苦用功和進步之大，可以想見，所以孫權稱讚道：「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我們看他後來怎樣的斷識軍機，怎樣的爲魯肅劃策，怎樣的計擒關羽，真是當「籌略奇至」之稱。魯肅起初本來有點瞧他不起，但魯肅代周瑜統軍陸口之日，有人說呂蒙現在功勞日高，聲名日大，你不妨去領教他。魯肅見了呂蒙，一談之下，呂蒙爲他策劃多端，使魯肅也爲之傾倒，於是拊其背道：「呂子明，吾不知兄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這就是「非復吳下阿蒙」一語的出處。從這點來說，關羽較之呂蒙，似覺不如，關羽沒有一點求知上進之心，雖也說他好讀春秋左傳，至今關帝像還是一卷在手，表現得很儒雅，但史載僅說他「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似乎沒

有怎樣用心研究。在謀路上，可說沒有一點建樹，威震華夏之時，不鼓氣直下，一不智。拒孫權之求親，失吳之好，二不智。撤公安南郡之兵以赴樊，中了呂蒙示弱之計，三不智。勇而無智，勇亦徒然。

至於和黃忠、趙雲、比較，黃趙的武功戰績也並不弱於關羽。

黃忠攻劉璋，常先登臨陣，勇冠三軍，斬夏侯淵，摧堅攻精，所向無前。劉備爲漢中王，很愛重他，想用他做後將軍，但黃忠那時和關羽的地位名望還差得很遠，因此諸葛亮說：「忠之名望，素非關馬（超）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劉備說：「吾當自解之。」於是賜爵關內侯，和關羽齊位。諸葛亮當時的說話，是針對了關羽的驕矜個性，也是故意向劉備一提，好叫劉備提高黃忠的地位，因爲黃忠不是劉備的嫡親幹部，比不上關張和劉備共赴患難，「恩同兄弟」的關係，他本是劉表的幹部，後來才追隨大耳兒的。

趙雲，一身是膽，他的勇武和軍功，也非同小可，長坂坡亂軍中護持後主，不辱君命。馬稷失街亭一役，慘敗得可憐，而箕谷一役，趙雲和鄧芝雖以兵弱敵強失利，但損

失輕微，諸葛亮問鄧芝，箕谷退兵，何以不致如街亭之亂，芝答：因為趙雲親自斷後，所以雖是退兵，却有秩序，兵將無緣相失。退兵尚能如此，趙雲的鎮定勇敢可知。更且趙雲是當時軍人中最有政治頭腦的一個，這點關羽不及萬一。起初他本是公孫瓚下屬，後捨公孫瓚而從劉備，可見他的卓識。孫權襲荊州，劉備大怒，欲東征討權，趙雲便進諫「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慕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渭河上流，以討兇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賞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這正和諸葛亮的聯吳伐魏的政略意見相同。他爲人剛和關羽相反，謙虛而慎重。從劉備平江南時，桂陽太守，趙範歸降，趙範有一位很美麗的寡嫂，範有意攀親，要將寡嫂嫁給他，趙雲說。「你我同宗，兄的嫂子也就是我的嫂子，無論如何，不肯接納。有人勸他勉強答應，他說：趙範那傢伙今日不過被迫投降，其心不可測，天下女子不少，何必後惹出麻煩。果然趙範不久便逃走。有一次生擒了一位敵將夏侯蘭，是他的同鄉，自幼便很相知，趙雲陳明劉備，救了他一命，那人精於法律，就推薦任用爲軍法官，但趙雲却不將他派在自己的隊伍。這許多審慎周慮之處。較



之關羽的粗枝大葉，自是不同。

然而話要說回來，關羽却是一個忠耿的軍人，他對漢室和劉備的忠懷磊落，是至堪敬仰的，他不僅有義氣，並且具忠心。惟忠然後能義，譽之爲忠義相全，實爲至當。試想，曹阿瞞用了許多籠絡手段，黃金美人，高官厚祿，要留他在魏，他却是不肯，那時劉備正在倒霉，曹阿瞞正是聲勢煊赫，要是利祿薰心之輩，那裏還顧及什麼情義，早就沒口的認賊作父了。可是忠義的關羽却對爲曹操作說客的張遼說：「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共生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如此顧大義，識大體，後世人的馨香膜拜，良有以也。而滿清轉移人心的政策和三國演義的過份渲染，都直接間接使民間老百姓更提高了那一股正氣，關羽變成了三國歷史的一個中心，而忠義的影響，支配着人心，愈加使中國優秀的傳統道德，發揚光大。這豈不是一樁值得贊許的事嗎？

## 七 論名士孔融

東漢的時候，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名士」，這種名士往往以清流自居，恃才傲物，好議論清談，自矜才調，便變成了達官貴人以外的一種聞人。到了漢末，此風大長，等而下之，這種名士更聯羣結友，互相標榜，立異千名，他們或與豪族權要相勾結，作爲進身之階，或製造聲名，使自己成爲社會上的偶像，朝廷上面的人怕他搗小亂，送他一半官半職，於是他們也做起官。這種人若果家世本來不顯，乃祖乃宗數得出有德望的人物，這一來「名門」所出的「名士」，就更加聲勢浩大，爲當世所推崇。漢末到三國時這一類的人物，竟在社會上有着頗大的勢力，曹操在未有建樹時，橋玄對他說：「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這位許子將就是月旦人物著名的名士許劭。許劭當時款納他，并且給他兩句評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姦雄」，據說曹操便由是知名。袁紹做了濮陽縣令歸鄉，軍徒甚盛，到了郡界，祇敢以單車返家，對賓客說：「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

。「怕的是許劭的「月旦」，又：有人勸劉繇用太史慈做大將軍，繇說：「我若用子義，許子不當笑我耶？」區區一許劭，當時潛勢力竟如此之大，足見名士的地位。

言歸正傳，這裏且單表孔融，

在同時期，名士羣中，孔融要算得是名士中的領袖人物，當時的孔北海，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他的享有重名，正如上面所說的乃因「家世」有了不起的人物，他是魯國人，又是姓孔，因此，他便成爲孔子的二十世孫，祖宗既是聖人，他的名望也就起人一等，再加以「幼有異才」，（連吃梨也「取其小者」，）可說自小便有名氣，據說：他十歲時隨父到京都，當時的河南尹李膺是名重一時的人物，不輕易接見人，他對他的「傳達室」下了一道令：「非當世名人或通家不得傳達」。孔融故意去見他，對他的門房說：「我是你們老爺的通家，」門房替他通報，那位李大人一見就問：「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對白：「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於是各人都大爲驚讚。這段故事是否真實，不得而知，但孔融自小，就是「小名士」，在他傳記中，却如此記載着。

後來名聲日大，達官貴人，都很怕他。何進大將軍因為受了他的侮辱，部下想派劍客去暗殺他，有「客」對何進說：孔文學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何進也就祇好賣好他，給以高官。有一個時期，孔融為黃巾賊所圍，「秀才遇着兵」，急窘之至，派人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這一個「驚」字，恰活現出劉備震於孔融大名的神態和表現出孔融的聲名地位如何的傾動當時權貴。

他們這些名士，是頗有一種做法的，所謂做法，第一是互相聯結、第二，是互相標榜，前者是他們的組織作用，後者是他們的宣傳作用。他們拜門結社，幾乎自有他們的名士圈，彼此聯絡，彼此幫忙，對何進大將軍進言的那一位「客」，雖未知姓名，誰能說不是他們名士圈的人物，他曾薦舉賢良鄭玄、彭珍、邴原、等，而邴原和華歆、管寧，時人號為一龍，王朗和孔融也是好友，總之，名士與名士都是互相聯結的。揚彪因為是袁術的親家給曹操逮捕入獄後，孔融「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

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曹操不得已便釋放了楊彪，這也可見他們的患難相助，互相幫忙。至於互相標榜，彼此吹牛，可說是他們的一種宣傳方法。孔融的幼年故事，誰能担保不是一種宣傳？禰衡、不過是一個徧徧的狂士，叫囂驕妄，孔融引薦曹操，爲之極力吹牛，說是：「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後漢書禰衡傳）但除了擊鼓侮辱曹操一番之外，却不見得如何英才卓犖，倘若是才智之士，何必這樣自取殺身之禍？顯然是孔融言過其實。

實在說來，名士多是華而不實，言浮於行的，他們除了廣交游，逞詞鋒，沽名釣譽之外，一點也不實在，既沒經國濟民的才幹，又無拯世濟人的懷抱，輕薄浮誇，無補實際，正如魏明帝詔書所云「浮華不務道本」。抱扑子漢過篇更道得好：「懶看文書，望空下名，結黨合譽，行與口違。」六朝王弼何晏，他們的清議作風，應溯源於此。

我們且看孔融這位鼎鼎大名的名士底「華而不實」的事實：

至今仍傳誦的是他的「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他做北海相時，每天過呼朋引

類，終日飲酒，在酒座中自然更是議論風生，大擺「龍門陣」，這是他的日常生活，其晏安狂放可想。某年飢荒，曹操以頻年興兵，又逢歲歉，會上表制止酒禁，孔融却和他爭執，說「酒之爲德久矣，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全是一套廢話，他不顧慮年歉糧荒，爲糧食計須禁釀以節約米糧，實在糊塗已極！他除了飲酒清談以外，實在沒有做過一點實際的事。做了六年北海相，其初和張饒打了一場仗，殺得大敗。終於「連年傾覆，事無所濟，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崔琰傳引九州春秋）到了後來做青州刺史，袁譚帶領人馬攻城，他毫無辦法，被圍半年，部下僅剩得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情勢危急得很，但這位大名士却依然是名士派頭，據說「憑几讀書，談笑自若」，及至城破，纔倉皇遁出，連老婆兒女也給袁譚擄去了！

有人批評這種名士：「志大而才疏，既不能勝其沽名徼利之私，又不能革其醜毒晏安之習，以是而當大任，其不折足覆餘者，蓋不鮮矣」。確屬的論，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單旅之才。」這也就說明名士祇會瞎

吹牛，實際做事能力却一點也不行。

然而，當時他們的勢力是很大的，因此曹操對於這批名士不能不用政治手腕設法去解決他們，解決的辦法，一方面是延攬，一方面是剪除。這也就是孔融，邊讓，楊修，禰衡所以被殺的原因。

曹操本身也可以說是帶有點名士氣的，就是當日的王公將帥，也都有點名士派頭。魏書引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緜巾」，「太祖爲人佻易，被服輕佻，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其輕易如此」（曹瞞傳）這豈非有點名士派頭？但是曹操雖有一點名士氣，他却是大政治家，唯其他是大政治家而又兼是名士，他就深懂得名士的弱點，知道所以剷除他們之道，使這批人或成爲御用品，或加以殺戮，以消滅他們的勢力。

首先，曹操以官職釣餌他們，若果名士們果真以清高自守，曹操也奈何不得，無如不做官的名士就很少，有許多人之所以做名士名流，其最終目的，大概就是在乎做官。名士名流的地位是做官的跳板，這樣一來，名士們是上了曹操的釣餌了，孔融官聲很大

，他又不安於做御用品，這是儘自取殺身之所在，假若孔融當時能做宦官祿，以他的聲名大可操縱輿論，即使讐議曹操，曹操也奈何他不得。這裏有一個很好的例，就是禰衡，禰衡對曹操脫光衣服，搥鼓譏諷，對曹操可謂侮辱之至，但曹操還是不敢殺他，將他送給劉表，劉表也不敢殺他，終於假手黃祖才結果了這個狂士的性命。

但已經造成「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地位的孔融，不獨自己做起官，還要拉攏別的名士做官，傳裏稱他「薦達賢士」，就是這麼一回事，他曾上奏保薦禰衡，又寫信給邴原，要他出來做官情詞懇切。（見北海集與邴原書）結果，他是不免誅戮，并且禍及妻孥，當時奏他一狀，說他對孫權來使誹謗，并且「大逆不道，宜極重誅」的是路粹。另一位邴慮也和孔融不對，加以攻訐，路粹邴慮都是曹操的御用名士，這一狀自然是出之曹操的授意，曹操以「名士攻名士」，孔融的悲劇於是演成。曹操殺了孔融之後，還嚴正其詞，下了一命令，說：「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艷，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皿器寄盛其中。又言君遭飢饉而父不肖，甯膽活餘人，



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獨恨其晚。」

曹操以「綜覈名實」的大道理翦除名士，在政治措施上固應如是，而名士們的最大弱點在於浮誇不務實際。

曹操屠殺的名士為數當在不少。其著者，孔融之外，崔琰因為言語冒犯下獄，繼而賜死。楊修，邊讓等都一一剪除，在除州屠殺了數十萬人，其中名士也定有不少。

除了剪除之外，另一手段，是延攬、華歆、郭嘉、鄒廬等，都延攬入幕，變成御用品。

曹操更進一步從根本削弱名士的勢力，是改變甄拔人才的標準。

第一，人才選拔不限於門閥、世家、普通軍吏，如果有功能的也可任郡國之選。建安八年，他下令道：「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這道未可與權。……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論者之言，亦似管窺豹乎。」這正是曹操要打破人才出於世家名士這種積習的一種辦法。因為門閥、世家、和名士大多是勾結互相倚勢的。

第二。用人唯才，選才唯能，不重高名美德，卽賤微薄行，也在選拔之列。二十二年，他下令道：「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名著千秋。吳起貧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崇尚治國用兵實際才能的人，反面就是鄙黜浮華不實的名士。

其次，又從培養人才的教育着想，他曾下令道：「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名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從政治措施而言，曹操這種政策是對的。他打擊名士，固欲消滅清議，使他能爲所欲爲，不受指摘，但名士們的竊虛名，破壞法紀，造成社會浮薄風尚，於國計民生實無益而有害，政治措施，貴能循名責實，曹操這種政治作風，也是改革社會風尚的正確的

對策。

後人對於曹操殺孔融這一段歷史，一般的感想是，惜孔融之才，恨曹操之奸。我的看法，以爲孔融不過徒盜虛名，那有什麼大才，他的被害也是自取。而曹操綜覈名實轉移社會風氣的措施，却值得佩服。至於禰衡這種狂妄之徒，殺他的不是曹操，而是黃祖，這種人就是生在盛世，碰着唐太宗那麼寬容大量的皇帝，恐怕也不免會自尋死路，根本與曹操無尤！

## 八 論顏雍

東吳和魏蜀分土爭雄，國運最爲長遠，它既不如蜀漢拾得出正統招牌，也不能如曹魏挾天子以自重，何以它的國祚能維持如此之久？論者會說那是因爲江東之地，土沃民富，得其地利之故。但我以爲這雖是一種好條件，却祇是條件之一。真正的原因，應該歸究到孫權在江東的撫有民心。孫權之所以得民心，則在於政治措施上採取寬愛仁慈的作風。

我們知道曹魏的臨民，用的全是欺詐嚴猛之術，他的政治措施苛峻之至，可說是純用法家刑名之道，蜀漢諸葛武侯，自小便慕慕效管樂，更以蜀地民情險惡關係，不得不尙嚴猛，其中雖也兼用儒家仁義之道，畢竟表面上是法多儒少，可說是法儒兼用，王霸同施。祇有東吳，寬刑減政，措施仁慈，視民如赤，以大信立天下，可說純用儒家治道，因而民心歸感，安居樂業，除了山越邊患之外，真可算得社會穩定，四民各得其所。

這種政治上措施的得當，說是歸功於孫權，無寧說全靠有幾位良輔之臣，相當國家大責，籌策有方；其中尤其傑出的不能不說是爲丞相十九年的顧雍。

當年的丞相，就等於現在的行政院長。是綜理行政的首長，也就是輔弼最高當局的第一把交椅的大臣。顧雍這位大臣，雖然在歷史記載上沒有顯赫的篇幅，吳書把他排在張昭之後，後人所做的小說演義，更將他當作一個配角，沒有怎樣看得起他。可是，我們細細去讀三國志，細細去研究孫權的政治制度，憲章和一切政治上的設施，顧雍實盡了最大的功勞。一個做了十九年丞相，坐政務官第一把交椅的人，一切行政大事，由他策劃主持是必然的。何況那時三國對峙，孫權雖統掌軍政，實在偏重於軍事，政治就要偏倚那時的行政院長爲他分勞了。

孫權沒有什麼大本領，但一個做領袖的人，能夠知人善用，并且能夠虛心信任，就可以收到分層負責的效果，這一點正是孫權的難得的大長處。孫權對於顧雍是非常看重的，他知道這個人的才能和長處，很適於做政治的重臣，就讓他做了十九年的丞相。黃武四年，顧雍接他老母到任，孫權表示敬意，居然降尊紆卑，親自迎賀，并且還自己跑

到顧雍家裏拜候那老人家，後來又叫太子去慶賀，可見孫權對他的崇敬愛重。

張昭年高望重，但孫權始終沒有給他做丞相。張昭自然也可算得是一個大臣，剛直敢言，而持正不阿，但畢竟才識胸懷比顧雍差得多。譬如曹軍八十万南下的時候，張昭害怕得不得了，他就是反對周瑜魯肅抗戰而主張迎降的一位主和派首領；他的剛直有時也近於執拗，並且頗有點小氣。有一次因爲一件事，和孫權鬧整扭，稱病不朝，等到孫權後悔謝過，還是不肯罷休，甚至孫權用火燒他的門，他也不出，這就未免有點執拗得過火，失却大臣的風度。所以當孫權做吳王時，想設置丞相，大家都推荐他，孫權沒有答應，孫權很巧妙的說：「現在正在繁劇之秋，職高責任更重，若果叫他老人家做丞相，反是叫他吃苦、不是優待他了」。後來首任丞相孫邵死後，大家又公推他，孫權還是不肯答應，並且明白的說：「此公脾氣太大，個性又強，所言不從，定會發脾氣生出岔子來，這反而對他不好」。結果孫權是看中了顧雍。

顧雍實在盡有張昭的長處而沒有張昭的短處。剛直持正但不鬧意氣，執理直言但態度謙和，見解論斷，切中適當，待人接物，誠摯有節，一切都恰到好處。

大凡做宰輔的要有宰輔大臣的風度，措施要有分寸，處事要忠耿公平，有爲有守，上可以爲人主調協百官，下要對老百姓愛護。這種職位，實在就是替國家當家的一個總管。做人主的差一些也不要緊，倘若有一位良輔，他可以左右他，國家還是治理得很好。最壞就是輔弼不良，爲皇帝當家的人，倘人選不當，就會連好皇帝也給弄壞。歷史上貪懦的宰輔當國，便會弄到政治蠹敗，民怨沸騰，甚至動搖國本，例子真多得很，也不必細表。大概貪財攘利的，固然不是好宰輔；就是唯唯諾諾，阿諛逢迎的，也不是好宰輔。一個良輔，要有公忠體國的赤心，犯顏敢言的正氣，第一是操守，第二是丰度，第三是做法。記不清是什麼人說的，大概是仲長統吧？他說一國的治亂，宰輔實負其責，故宰輔重於人君。又黃宗羲的原臣論說：「夫治天下，猶曳火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右手不執拂，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嬉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爲臣爲臣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爲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四

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纒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這些道理，就是說做大臣的要公忠體國，撫民若赤，并不是僅僅順從皇帝，就算得做忠臣良相。

還有一層，宰輔大臣，他的責任正如陳平所說，是「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撫百姓」。因此他要知人善任，還要懂得分層負責的道理，「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關於這種種做宰輔大臣的條件，我們可以衡量一下顧雍，他真是都具備了，并且綽綽有餘。

說到操守，他是潔身自好，廉正無私的人，傳裏雖然沒有說他怎樣的廉潔，但他拜了侯爵而家裏的人還不知道，從這一點便可以說明他公而忘私。他的公館一定不會怎樣堂皇，家人也不致於會享用奢侈。他對於子弟家族，約束得很嚴，不稍容縱，使其恃勢



橫行。有一次孫權嫁從女，那位從女和顧雍是親戚，因此也請了顧雍父亲和族孫顧譚陪宴。顧譚當時也做着大臣，頗見寵任，他喝醉了得意忘形，竟在席上三次起舞，並且舞個不停，這是有失體統的事。顧雍到第二天叫他來教訓一頓，說：「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由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罰顧譚站在那裏思過，很久才准他走。這和許多權臣的縱容子女越法胡爲的真有天淵之別。

他的爲政是愛撫百姓，施行仁政。在他年輕時担任州郡的政事，也就治績卓著，「吏民歸服」，他做了丞相不久，孫權便有過這樣一道撫慰百姓的令：「軍興日久，民雖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外方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這一道與民將息的命令，自然是他的愛民德政之一。十九年中，他的主張，左右着孫權，處處要薄斂寬刑，施行德政。嘉禾三年，孫權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赤烏三年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收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這些都是例子。有一次張昭聽到輿論，說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因奏言須減繁苛的法令，孫權沒有答他，轉而問顧雍說：你看怎樣？顧雍答道：「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孫權便請獄輕刑。像這種愛民如子，事事體卹民艱的幸輔，怎不令人敬戴。

他的丰度は「寡言語，舉動時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可以想見他的沉着雍容。孫權曾讚嘆的說：「顧君不言，言必有中」。他的「寡言語」和「言必有中」，是何等可愛的丰度！大概他的儀態，也是一派的正氣端方，因此每逢飲宴歡樂的場面，左右的人都怕酒後失態，會給他瞧出，也就不放肆，連孫權也說：「顧公在坐，使人不樂」。然而他却并非態度凌厲，一定不是專門板起一副冷面孔的人，我們看下面這一段故事：

「呂壹奏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緝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

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首無言，時尚書郎懷敍，面詈辱壹，雍責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呂壹這種貪酷之吏，并且還向他倒蛋過的，及至姦發繫獄，他還「和顏色」的詢問，懷敍詈罵的態度，他也糾正。可見他態度的大方，并不是公報私仇那一類人的作法。「官有正法，何至於此」的說法，活現出一位標準大臣的丰範，他的儀態正如孔子所說的：「溫而威」。

他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惟其地位高，他愈要了解下情。一個賢相沒有不勤求民隱的，祇有那些自身腐敗的貪佞之臣，才會朦朧上峯，使下情格不上達。顧雍是：「時訪遠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這種「民情密報」的工作，如果是一個御史之類的官去做，那便沒有什麼希奇。難能的是一品丞相肯如此做法。「訪遠民間」的事，如果是縣令那種芝麻綠豆官去做也沒有什麼希奇，難能的是丞相的身份咧！記起唐甄曾在他的名著「潛書」裏說：「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

天下之下」。(抑尊篇)顧雍確實做到這一點。

他對上是「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對下是勤求民隱，這種丰度已經夠使人欽敬了。但還不止此，他又能選任人才，各盡其職，吳志載：「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這就如陳平所說的「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說來似乎沒有什麼，做到却甚是困難。因為大凡位列宰輔，不能不揆荐人才，揆荐人才第一在去私。有些人一旦位高權重，便任用私人，或是裙帶親戚，或是門生故舊，不管阿貓阿狗，一律雞犬升天，他們恃有靠山，一定橫行無忌，貪贓枉法，弄得一場糊塗，貽害公事，這就是不能去私。第二在知人。選賢與能，知人善用，才能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宰輔之官，此點至為重要。

他還有一種長處，就是：「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這也不是一般矜功自驕，專為自己吹牛的官吏所容易做到的。

從許多方面去觀察顧雍，他所具備的許多優點，都活現出他是一位良輔的標準典型。

東吳的國祚悠長，民心的安定，在顧雍十九年爲相的這一個建國最重要階段中，已經奠下了基礎，所以能收獲如此的效果。顧雍在東吳政治史上是一個大功臣是不能否認的。

末了，我覺得陳壽批評孫權對張昭和顧雍的關係所下的評語頗不同意。陳壽說：「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審方直，動不爲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志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如此云云，似乎說孫權不用張昭爲丞相是怕他位高功大，爲人嚴直，果真如此，顧雍也是嚴直的人，孫權嘗說：「顧君在坐，使人不樂」，何以也用他？根本是孫權知道張昭這老頭兒雖有許多長處，但丞相的人選，還不如用顧雍。這正是孫策臨危時對孫權所說的：「舉賢任能，我不如卿」的一個好例子。那能說權用人不如策？至於對顧雍的評價，僅是輕輕的八個字：「依杖素業，將之智局」也似乎太漠視了他的大才。

王船山批評顧雍，說他：允爲天子之大臣，足與諸葛武侯頡頏，有曹參之簡靖而不

弛其度，有朱璣之靜正而不灑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惟李坑近之。自是的論。

## 九 論曹丕與曹植

歷史上皇室兄弟爭位的故事很多。因為帝位九五之尊，皇帝的寶座較之骨肉的親誼，倘從利害觀點上看想，無甯是取前者的。就如一世英主的唐太宗，他也是不惜殺掉他的哥哥建成，演着「玄武門」大打出手的一幕，去取得帝位；史書上雖說建成有意先害世民，但誰能知道當時的真相呢？所知道的，兄弟相爭殺却是事實，這種事實，每一個朝代的歷史，幾乎都有着醞釀，可說是皇室的一種家常便飯。曹魏自曹操艱辛地完成他的大業後，自身雖還未敢公開正式登上皇帝的寶座，但他的兒子們早已把自己作為皇帝的繼承人自尊的，曹丕和曹植的明爭暗鬥自屬不可避免的事。結果是曹丕成爲文帝了，曹植僅僅惴惴然保持了陳思王的地位，然而曹植雖然失敗，却還幸而保存了性命。雖則「相羨何太急」使他感到痛苦，但畢竟曹丕對他也還算得優容，曹植屢次上表發牢騷也曾優詔答勉；這不能不說曹丕較之唐太宗還重視骨肉之情，其實「相羨何太急」那

一首詩是否出自曹植手筆抑或是後人故意僞作還是問題，傳說是曹丕要殺他，逼他七步成詩，否則便藉口加害，這事情必非事實，假如曹丕要殺他，要藉口的事情多得很，何必還要逼他做詩，以詩才敏捷與否來藉口殺他？譬如：黃初二年，盛國謁者灌均，奏曹植醉酒悻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求治罪，曹丕也不過僅僅貶了他的王爵，降爲安鄉侯，并且說：「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要加以罪名藉口殺他，真是何患無詞，劫脅使者，也還沒有殺他，會逼他做詩去殺他嗎？這是必無此理的。又如：曹丕的妻子甄后，本來是曹植求而不得的，曹操給了曹丕，曹植始終愛慕他這位嫂嫂，黃初中入朝，曹丕知道曹植一向愛慕甄后，還將她的一個名貴的枕頭送給他，留他宴飲，使得曹植神魂顛倒，居然做起一首賦來，這就是傳誦千古的「洛神賦」，據說洛神賦，起初就是命名「感甄賦」的，到明帝時覺得有點那個，才改爲洛神賦，這篇賦做得極其風流綺麗，甄后雖然爲郭后讒死，究竟也是曹丕的后，曹植的嫂嫂，對嫂嫂想入非非，說了許些薦枕懽情的話，曹丕何嘗不可以加他一個影射和侮辱的罪名殺他，事實曹丕不却沒有，既很大方的送給他以遺枕，也不把他的色情描寫近乎害單思病嚙語的感甄賦



構成什麼罪狀，其顧念骨肉之情和胸懷氣量可想。

曹植的才名，後世雖然備致推崇，從他的性格看，也不過僅止於是一位放浪享樂的風流才子而已，他可以說沒有一點政治才具，儘管他後來，屢次上表說希望統軍出征，發揮許多政治軍事方面的道理，這不過是他悶慌了，借此發洩，終於是紙上文章；何以見得他沒有一點政治才具？本來曹植的文才，早爲他老子所賞識，也曾屢有意立他爲嗣，他老子曾說：「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魏武故事）其寵幸初過於曹丕，無如「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魏志）還加上好聲色之樂，這都十足表現出一位皇室公子哥兒那種不長進的個性，他事事博不到曹操的歡心，相反的是使他老子對他日爲失望，最使曹操不樂的是擅開司馬門一事，真算得任性妄爲，做事全無分寸，試想本來已經取得信任的地位反而「寵信日衰」，稍爲懂得一點政治手段的人會這樣失敗嗎？從他的爲人做事，就可以見得沒有政治才具，我倒佩服曹操不立他爲嗣的卓見，像這樣的人，很可能做了皇帝後更加肆無忌憚，變成昏淫之君。曹丕呢，他在寵愛上後來居上，爭取了曹操的歡心，雖說「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魏志）但爲其矯情自

飾，更足見他的政治手段，他登位後的一切政治措施，很有分寸，曹植未必及得他，後世人往往由於「相羨何太急」那一首詩，多數同情曹植，因而推崇曹植，對曹丕反而不給予較高的評價是不很公允的。

驕縱，魯莽，狂放是曹植的性格。

醉酒悻悻使者是驕縱，乘車行禁道中，開司馬門是魯莽，曹仁爲關羽所困，曹操以植做南中郎將，號征虜將軍，差遣救曹仁，酒醉不能應命，是狂放，直至後來在曹丕「不建親藩」的政策下還不知分寸屢次上書要求自試，要求掌兵前線，危言激烈，燥急得可笑可憐。

相反，曹丕的性格却是穩重，謙和而有機智。曹操有一次要測驗他的兒子：「遺太子（丕）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者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曹植受了楊修的通知，做法雖然合法，但曹丕，「不得出」便祇好不出，這也足以表現他的穩重，至於謙和，即對曹植而言，也算得謙和有度，在他登位之後，曾下令叫百官盡量諫奏，說：「軒轅有明

臺之議，放勳有衛室之間，所以廣詢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卒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雖是照例的官樣文章，但他處事對人却也不能不說是謙和的。就機智而言，曹丕較植強得多，他能夠「矯情自飾，宮人左右并爲之說」，變換了曹操的寵愛，爭取了嗣位，其機謀智慮，自非魯莽的曹植所能及。

曹植後來因爲「常自憤怒，抱利器而所施」，常上書求自試，那許多奏言，祇是滿腔抑鬱抒發了許些牢騷，却未見對當時利害得失有所指陳，政治措施有所建議，以此而冀邀大用，能否真的擔當得起大任，真的可以如他自己所說的「輔主惠民」，或建樹一點軍功也很可懷疑。

他的屢次上書，無非如下的說話：

「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麗，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鏃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驥，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敲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

氣概固然說得非凡，但對於當時軍事形勢，政治利弊，並沒有什麼高見陳述，足見曹植不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即使曹丕不存芥蒂之心，他也不肯隨便就加以大用的。

還有一層，曹丕的政治措施，一開始就要削弱諸藩王的勢力，其次，是要杜絕后黨的干政，宦官的弄權，這都是兩漢以來釀亂的禍根，曹丕懲前毖後，前車足鑑，因此要杜絕王室、后族、宦官等的權力，不使其抬頭。而曹植對於曹丕這種政策，沒有了解，還時時提及「崇親親篤骨肉」的說話，真可謂不知高下。有一次，他表奏說：「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挾蘇之諫始皇，淳於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可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

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此其榮，沒同其禍，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這恰恰觸犯着曹丕之所忌。在曹丕這種政策之下，曹植的慷慨陳詞，欲求試用，徒見失言。

由於歷史的教訓，使得雖然是謙和的曹丕，也對他的許多諸王弟兄，不稍留情；「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篡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閡之恩，而監國使者不「聽」。〔裴註引魏氏春秋〕。

曹丕除了這種削弱親藩的政策之外，還禁止婦人干政，他曾下了這樣的詔書：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他簡直要根絕婦人與政的禍害。這也是由於兩漢末世的外戚驕橫的教訓，使曹丕有戒心所使然。再，就是限制宦官的職責：「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寶。」（魏志）

親藩、外戚、宦官，這三種人往往會釀成禍亂，曹丕事先杜防，也不無卓識；至於

後來篡魏的，不是三種人，而倒是權臣司馬懿父子，因此也有人批評曹丕不智的，其實這也怪不得曹丕，歷史上誰能夠萬世一系的坐着皇帝寶座呢？

曹不在位僅是短短的八個年頭，然而他的政治是頗有成績的，他總不失爲一個明白公允的人主。如肯納忠諫，禮待人才等。他也常常遣人問民間痛苦，貧苦的老百姓，會常常得到救濟，他對於選拔賢能也極注意，有一次，他下了一道詔說：「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尙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可糾故不以賢者」，他對拔用人才，也和他老子曹操一樣不拘一格，並且不限年齡，唯重「通經術，達文法」的人才，足見其求才務重實際。

他和曹植都算得是短命的，他死時僅僅四十歲，曹植還比他多一歲，死時四十一。曹植的滿肚牢騷鬱憤早死，是似乎有理由的，至於曹丕，雖然得意，也並不甘心廣延年，大約，他的性情，也始終帶有一點神經質的感傷，他做太子時，看到處瘟疫四起，也曾寫過一封信給王朗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

莫如著篇籍；瘦獮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這些詞句，就是頗感傷的。

說到文學方面，千古以下，大家把曹植的詩文推崇得很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來說，曹丕似乎及不上曹植。這原因，第一，是人們總是同情失意者的，大家都認為曹植爲曹丕所逼，他的境遇很可憐，文窮而後工，因此對於他的詩文給予過分的同情與推崇。第二，曹丕究竟是登上皇帝的寶座，無論他的文學做得怎樣好，在一般清高的文人看來，也要把他作品的價值估低。譬如「詩品」上的評價，曹植的作品列入「上品」，曹丕的作品祇列入「中品」。

實在公平說來，曹丕的文學理解，要比曹植強得多，曹植的作品，我們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詩章，一部分是詞賦。詩章方面，固然清綺逸麗之作不少，但也有過於綺麗過於造作，變成專在辭藻上用功夫，氣韻反而不暢的。至於詞賦方面，他的許多什麼賦，除了模倣堆砌之外，簡直不見得有什麼長處，由於他的作風，以後是開了六朝綺麗駢偶的風氣，還使文章走入一條反靈性的道路咧。曹丕呢，他的作品也可分爲兩部分

一部分是文學理論方面，最顯著的就是他的驚人的傑作「典論」，「典論」一書，雖已散佚，但僅就所存的一篇「論文」而言，對文學派別和文學批評的見解，卓絕精審，決非曹植那一些綺麗的詩篇和堆砌的詞賦所可比擬。另一部分是詩章，他的樂府，清越暢曉，他並不較曹植作品爲低，上品中品的評別，可說是不公平的，所以然者，正如劉勰所說：「文帝以位尊而減才，子建以勢奢而益價」（文心雕龍）而已。

不僅在文學方面，曹丕較曹植并無遜色而且過之，就是武藝方面，曹丕也是一個好身手。我們看他自己在「典論」自敘上的敘述：「六歲而知射，八歲而能騎，少好弓馬，於今不衰。或言聞君善左右射，實爲難能。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余於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就算他敘述得稍爲有點誇大，究竟他也不失爲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我的結論是：曹丕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曹植高明得多。



## 十 論魏延

諸葛亮剛輪下，屍骨還沒有寒，軍隊內部就立刻發生變故了，這是一件使人不能無「感」的事。從這上面，可以看出諸葛亮平時控制人事的力量。但也可以看出「人亡政息」的悲劇。

在回師的歸途中，魏延和楊儀火拚了。這一對久已「磨擦」的對頭，早已潛伏着不可消除的積怨，他們終於得到一個需要爆發感情的機會。結果是楊儀勝利了，他殺了魏延，還安上他一個極不名譽的罪名——反叛。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也似乎有意相信楊儀的誣告，因此把魏延渲染成一個反叛的角色，穿插些「腦後有反骨」一類的話，並且說是諸葛軍師老早就看出他的「反相」來的。於是魏延便成了社會大眾所唾棄的一個人。楊儀反而沒有什麼人去指摘了。

其實，反叛的是楊儀，却不是魏延。好勝，倔強，驕矜，因私害公，不顧大局，這

都是魏延的壞處，但却不能說他要叛蜀附魏。而魏延上面的壞處，楊儀也正是相同。同室操戈，火拚之局，兩個人都要負罪名，不該全推在魏延身上。并且，殺魏延的究竟是楊儀，而楊儀當時的權力比魏延要大得多。

歷史，和「寫出來」的歷史，其間一定已經有了許多差別。魏延和楊儀「積不相能」，是事實，但諸葛亮死後火拚起來的真相，還是一筆糊塗賬。蜀書魏延傳的記載是：

「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

但魏略的記載却不同：

「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守，慎勿後來也。令延憚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長史楊儀與魏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魏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而走，追而殺之。」

這兩種記載，顯然有別，魏略似乎有點為魏延抱不平。但以理推想，諸葛亮是不致

這令魏延慚行已事的，與其說他推重魏延，無寧說他推重楊儀，并且費禕是他所最尊重的人，退軍之計，當交付給費禕執行，斷不交魏延全權辦理，魏略所載頗不近理。可是在蜀書魏延傳裏我們覺得也有可疑的：爲什麼當時的「密議」，不叫魏延參加。魏延是那時的北伐軍前敵指揮官，也是一員重將。諸葛臨終的軍事會議，理應召他參加，何況諸葛的決策，要魏延斷後，正好共同商議，當面遺言，何致要後來由費禕去試探他？這是可疑者一。所載魏延一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云云，魏延當時是担任前鋒，「出亮營十里」若果拔營南歸，楊儀等那有不知道，不加阻止，而致燒絕閣道之理。并且楊儀果真回師南歸，何以後來却逃亡漢中，遣馬岱追斬他？這是可疑者二。魏延的「善養士卒」見諸本傳，可見他和部下是相處得很好，能得士兵的擁戴的，但後來楊儀叫何平去逆擊他，所載是：「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卒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何平是什麼人？那能輕輕幾句話就使「善養士卒」的魏延的部下「一時解體」而且一下子能有燒絕閣道的「士氣」，一下子又能如何簡單的「莫爲用命」，這是可疑者三。

從這些「空子」看來，那裏大有是非不能明之處。陳壽對於這一幕內閣歷史，顯然似乎不能把握到真像。

依個人的臆斷，可能有下列的事實：

一、魏延當時不同意退兵，（他曾對費禕說：「丞相雖亡……吾自當率兵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楊儀公報私仇，因此就說他意圖叛逆，串同費禕設法解決了他。魏延平時既志高氣盛，容易得罪人，大家也就落井下石，而他手中的部隊，爲了諸葛亮對他也有限制之故，人數不多，很容易便被解決。（「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亮制而不許。」）

二、魏延既善養士卒，他的部下一定抵抗，結果爲楊儀殺戮殆盡。因此用「延士卒知曲在延，軍皆散」的話來掩飾，僞報。

三、「燒絕閣道」是楊儀的誣告，「與衆北附」，也是楊儀的誣告。魏延沒有叛漢附魏的居心，楊儀却存圖害魏延的決心。

由於這種臆斷，魏延是極端被冤誣的。他的驕蠻的個性是他一大缺點，但他的梗直

和勇猛，善養士卒的將才，是諸葛亮所深知的。諸葛亮臨終的退軍策劃，要魏延斬後，實在很有道理。他知道魏延的個性，才能。知道他或者不同意退軍。所以叫他斷後。諸葛所說，「魏延不從命，軍便自發。」的「從命」的意義，是指延對於退軍一事的態度而言。并非說魏延有反叛存心不服從命令的意思。所以諸葛想到即使魏延不從命退軍，軍也可自發。因為這并無大礙。無論從命與否，魏延的斷後作用，是會達到的。這正是諸葛亮深知他勇猛的一種安排。的確，在關張之後，蜀漢的勇將，魏延不能不說是數一數二的。

如果說魏延有反心，他所反的是楊儀，却不是朝廷。他爲私人的怨恨而反對一個大臣，這是個人的磨擦問題，歷史家和小說家却將他披上反叛的外衣，判了叛逆的大罪，不能不說是有欠公允吧。

魏延本是一個老粗，自然敵不過楊儀的政治手腕，在外面隨軍的人，如費禕等都是和楊儀要好的，在朝廷內面的人，蔣琬董允，也都是左袒楊儀的。我們看如下的一段記載，就可明白魏延吃虧的地方在那裏：

「延儀各相表叛逆……後主以閹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疑延」  
。（魏延傳）

但是蔣琬董允所保的楊儀，後來因為做不到替代孔明的尚書令地位，憤憤不平，却  
不打自招，說出他當時曾有附魏的存心：

「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  
已。」（楊儀傳）

那末居心叛逆的，不是魏延，却正是楊儀。

魏延的「勇猛過人」，究不失為一英勇的軍事人才。他的戰功也是不可抹煞的。羌  
中陽谿一役，大敗魏將費瑤和雍州刺史郭淮，戰功赫赫。當昭烈遷治成都時，出乎衆人  
意料之外的拔選他督軍漢中，坐鎮一方，各人都吃了一驚，因為他當時的名望地位，却  
不及張飛，那個位置應該是給張飛的。昭烈大會羣臣的時候，問他任此重責，有沒有把  
握，他的答語是：「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  
。」這顯示着他如何的有勇氣。大概因爲昭烈這次過份的選拔，也就長了他的驕氣，并

且招人猜忌。弄得大家都對他感情不好。

但是他的驕矜，使他連諸葛亮軍事計劃也不同意：「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諸葛亮自然不肯答應。然而他的戰略也有是處的。諸葛亮北伐的路線，是要由祁山進攻秦隴，魏延提出的意見，是可以分兵一路由子午谷直搗長安。那時守長安的是夏侯楙，急軍巡趨，長安可下。所以魏延請求精兵五千，直從褒口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預計十日可搗長安。并且他說，那時丞相大軍從斜谷來會，一舉即可將咸陽以西佔領。他這種計劃，在戰略上是正確的，我們不能說他錯誤；反之，我們知道諸葛亮繞祁山取秦隴的計劃，是一種穩慎的戰略。因為諸葛亮既經決策，不容更改，也就不接納魏延兩路出兵的意見。照理，第一，長安是必須攻下的，長安不攻下，不能動搖魏的基礎。第二，取秦隴的路線，不及直搗長安那麼快，攻取秦隴，長安也就必然增加防禦，倒不如趁早雙管齊下。但諸葛亮畢竟拒絕魏延的意見，因此後來的史論家，有認為諸葛亮的北伐攻魏，實在祇是一種以攻爲守的政略。例如王船山在他的讀通鑑論裏就這樣批評：

「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諸葛繞山而西出祁山，趨秦隴，奇兵也。高帝舍棧道而出陳倉，以奇取三秦，三秦之勢散，附其背而震驚之，而魏異是，非堂堂之陣，直前而攻其堅，則雖得秦隴，而長安之守自有餘。魏所必守者長安耳，長安不拔，漢固無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於散地，魏且以爲是乘間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則敵氣愈壯，而我且疲於屢戰矣。夏侯楙可乘矣。魏見漢兵累歲不出而志懈，卒然相臨，救援不及，小得志焉，彌旬淹月，援益集，守益固，卽欲拔一名都也且不可得，而况魏之全勢哉。故陳壽謂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誠有謂已，而公謀之數年，奮然一朝，豈其不審如此哉，果畏其危也，則何如無出而免於疲民耶？夫公固有全局於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後主之不可一隅以光復也，其出師以北伐，攻也特以爲守焉耳，以攻爲守，而不可示其意於人，故無以服魏延之心，而貽之怨怒，秦隴者非長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門戶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險而民強，誠收之以爲外蔽，則武都陰平，在懷抱之中，魏不能越劍閣以收蜀之北，復不能繞階文以搗蜀之西，則蜀可鞏固以存，而待



時以進，公之定算在此矣，……以是知祁山之師，非公初意，主闢而敵強，改圖以爲保蜀之計耳，公蓋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叢語也。」

船山的論斷，以爲出師祁山，是「以攻爲守」，簡言之，說諸葛并非真欲直搗魏都，所以不接納魏延正確的意見，雖有理由，却不見得是對。諸葛的出師祁山，大舉人馬，上表陳詞是決心殲敵的。而且他的「漢賊不兩立，王道不偏安」的思想極爲堅強，諸葛亮的志向，何僅甘於偏安，守的局面，至多也不過是偏安的局面，諸葛養蓄精銳數年，作有計劃的北伐，那能說他的定算止於守局。他的所以拒絕魏延的軍事獻議，一半是由於他步步爲營的謹慎的軍事作風，一半也是輕視魏延祇是一個饒勇的武夫，所謀近於冒險，因此把魏延的獻議拒絕了。

從蜀漢後來的人才而論，尤其是將才而論，無論如何，魏延之死是一個損失，關，張，趙，馬，之後，魏延無疑是一員足以攻堅陷陣的猛將。諸葛謝世而後，軍事的幹才，祇剩了姜伯約這個碩果，然而後來用到糜化這種腳色做先鋒，真覺得蜀漢將才均每况愈下，假使魏延不死，拒敵權堅，對漢祚不是沒有少許裨益的。說到

這裏，我們不能不對董允、蔣琬、費禕等重臣有所微嫌，這些重臣在丞相死後，負起策劃大局的重責，應有排難解紛之方，防微杜漸之計。明知延儀不睦，却無法消弭禍患於未然，費禕曾往見延，「揣延意指」，但幾乎爲延要挾，却未能動以大義，曉以道理，使他共顧大局，等到「延儀各相表叛逆」，蔣琬、董允又不持平勸阻，反而有所愛憎，保儀疑延，使兩人衝突益不可收拾，終於兩傷其一，這不是愛惜人才，爲國家前途計的辦法，這一幕內鬩的悲劇，號稱承繼諸葛地位的琬、禕也不能辭其咎。

## 十一 論漢奸譙周

三國人物中，我對譙周最鄙厭。此公口道聖賢之言，行爲却最無恥！據說他「詞理淵通，爲世碩儒」，他的書也真讀得不少，著作也相當多，可是這種讀書人有什麼用呢？他從書本上所學得來的道理，不是用來經世救國，却用來出賣國家，這是最無廉恥的讀書人！

阿斗固然不能說他是一個英明的人主，然而他也不能算是一個頂壞的皇帝，試看昭烈賓天，他承繼大位之後，對於武侯是必恭必敬信任的，一切事情任由武侯作主，自己却安守本份，不作一點威福，也可見他英明雖不足，純厚却有餘。鄧艾代蜀之際，可憐這位純厚的皇帝，身邊再沒有幾個像樣的大臣，有的，就是這位唯一元老譙周，他要他分憂，他要他爲國家出主意，定大計，而這位無恥的老朽，說完了一大套失敗主義的理論後，祇有一個沒出息的主張，「降」！照理猜想，後主當時雖然沒主張，徬徨焦急，

但他一定不會想到降，他那有胆量想到自己父親以數十年汗血得來的天下，由自己雙手捧送他人，這對他是一種不敢想像的概念！但等到譙周說出一番抗戰無用論的道理之後，他的潔白的腦膜，便不能不染上這污點了。一時爲情勢所迫，爲游詞所動，他終於走上最不光明的一途，使天下後世將他看爲一個最沒出息的亡國皇帝，我們今日一面爲阿斗惋惜，一面却不由不增加對譙周的唾棄，說句公道話，阿斗還可說是「君非亡國之君」，譙周則「臣是亡國之臣」，沒有絲毫可曲恕的地方！

當時鄧艾從陰平進攻，步步進逼，諸葛瞻打了敗仗，形勢固然險惡，但姜維仍有一部分勁旅，并且姜維和他的部隊，都還有決一死戰之心。蜀志載：「維等初聞諸葛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甯，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窺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請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砍石」（姜維傳）就此「拔刀砍石」四字，也足見當時蜀軍之士氣猶在，其後姜維雖不得不降，但顯然還想利用鄧艾鍾會的磨擦，以徐圖光復，維降鍾會時，鍾會對他說：「來何遲也」。姜維却正色流涕以對：「今日見此爲速矣」，其苦衷實有難言之痛，華陽國志有一段記載

說：

「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社稷危而復安，寰宇傾而復奠」。

這段記載，我們相信是真實的，諸葛亮也曾贊美姜維：「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可恨的是譙周感動後主，決定降局，終於鑄成大錯，不能忍數日之辱，使社稷危而復安，譙周之罪，浮於秦檜！

其實倘換上一個忠國的老臣，決策是祇有兩條：一是固守成都，成都倘難固守，遂步退南方守白帝，鎮夜郎，據險抵抗，背城借一，即不可為，也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生死以之的決心，甯為玉碎，不作瓦全。二是東退入吳，徐圖恢復。却絕不能走上另一條路——降。

但譙周口誦聖賢之書，却不知「臨難毋苟免」，心眼兒填滿一個無恥的降字，虧他還侃侃而言：「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他所說的「古義」，不知出自何書，簡直連古人也辱沒煞，我們讀文信公轟轟烈烈的遺言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真欲起譙周枯骨，鞭之三百。

譙周無恥的行爲，已使人切齒，最可鄙恨的，他偏還有一套漢奸理論，他的不戰而降的失敗主義者的觀點是：（一）退守南方不可，恐南人反叛。（二）魏軍勢強，而將乘勝窮追。（三）依吳也非久計，吳小國終爲魏滅，結果還是屈服，再辱不如一辱。（四）自古沒有寄人他國之君，到君仍須爲吳屈。照他這四種觀點，便否定了上述的兩條大路——南退守，東入吳。抗戰圖存，既不合「古義」，流亡政府更不合「古義」，合古義的便祇有北面事仇。可憐當時也就無人嚴予痛斥，祇有人在這其實是死路一條的問題上猶疑追尋一個可恥的答案：「恐不受降，如之何？」於是譙周就更能提出「古義」，以補足他的漢奸理論的「結論」。

於此，我們不由不懷念敬仰起東吳的魯肅，來和譙周作一個極端相反的對照。當曹操八十萬大軍東下之時，東吳羣臣慄於重兵壓境，多數主張迎降的，獨魯肅忠勇過人，力排衆議，他嚴斥張昭主和一派，說：「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將軍迎操，

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這是何等硬漢。他懇切說出祇有降臣，而無降君，爲臣者求一己偷生苟安，可以降，但爲君者降將安歸。這才不是替「爲臣者」一己打算的忠君愛國的大道理，卒能奮力抵抗，大敗曹軍，轉危爲安，我們試將魯肅的忠言，來對比一下譙周的屁論，人格的偉大與卑鄙。相去真不啻天淵。

譙周之所以獻降策，自然是由於他珍惜一己的這條老命，他害怕城池粉碎，狗命不保，因此祇有偷生求榮，希望將來還可「品其名位」，便拉了那位懦怯的皇帝下水，這種賣主辱國的奸臣，出發點就在一個私字。

後主的降書，有「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心從命……伏維大魏，布德布化，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救賜，惟所裁之」的誠惶誠恐的話，這種大文章，自然又是譙周才做得出來；果然沒有出他意料之外，後主降後，「魏裂土以封」，因此他倒無須乎拿出他的所謂古義去爭了。更其得意的，是大魏賞識了他，品其名位爲陽城亭侯。（其後，換了一個朝代——晉室踐祚，他依然做着大官，成爲三朝元老，極生前之榮。）可是他這個侯爵，是把蜀漢整個江山加上一個懦怯的皇帝換來的，大魏對他的酬庸，也不算怎樣皇

天浩蕩逾格賜恩。

這一段故事，後來歷史家的批判，意見是不一致的。因為有些歷史家好說陳死人的好話，似乎要立心隱惡揚善。因此這位漢奸，也有歷史家爲他洗脫罪惡。使我最駭異的是陳壽的評語，他批評道：

「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劉氏無虞，一邦蒙賴」，這樣一來，譙周倒有功勞了吧？陳壽本來還不算糊塗，其所以如此批評者，大概一來是隱惡揚善，二來是要討好朝廷，因爲譙周於蜀漢爲漢奸，於晉室却算是功臣，以晉朝立場修史，不能不給予好評，除此以外的理由，我們實猜想不到陳壽何以要恭維這個無氣節的人。

也有一些歷史家祇將過錯歸於阿斗一人，以爲罪在朕躬，與譙周無關的。如孫倬評道：「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以事讎，可謂苟存！」

這是祇責阿斗，不及譙周的。另一位歷史家孫盛，見解却較爲恰當：他的評語是：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下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感矣。」

對於後主，譙周，並加貶評。最嚴正的評語，我以為當推王船山，他在「讀通鑑論」裏對譙周嚴詞痛斥，憤恨其人，見於字裏行間：

「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譙周之爲尤惡也。道鄙夫也，國已破，君已易，貪生惜利祿，弗獲已而數易其心，而周異是，國尙可存，君尙立乎其位，爲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惟恐劉宗之不滅，懼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然焉，非人臣也……臣子之道，食其祿，終其事，志不可奪，烈於三軍之帥，且使人必不靡於邪說，兵力不銷於荒惰，延之一日，而忠臣志士之氣，永於千秋，周而無人之心哉……餌愚民，媚奄宦，爲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已乃全其利祿，非取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周之罪通於天矣！」

這批評才算是痛快淋漓，義正詞嚴。并且，王船山還追溯到他平日的爲人，說：「當周之時，黃皓，陳祗，蠱庸主而不顧百姓之疾苦，誠念民也，則亦斥姦佞，勸節儉，

飭守令以寬廉，使民進而戰餽，退而休息可也，周塞目箝口，未聞一讒言之獻，」這種人平日居官，尸位素餐，那還有什麼讒言？有人說譙周所以敢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莽肆人，雖無他算，然於殉鄙恥，或發怒妄誅。」（張璠）這也可見譙周對後主的用心，正如王船山所謂「處心積慮，惟恐劉宗之不滅」

自然，僅僅說後主是一個「懦弱」的皇帝，甚至如我開篇所說的「君非亡國之君，」也未免太過爲這位亡國皇帝洗脫責任，因爲在劉氏皇裔中，一位轟轟烈烈的好漢北地王湛，却甯死不屈，壯烈地殉國。北地王湛之言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

他壯烈地以身殉了國，若將這位北地王湛來比較阿斗，那真顯得阿斗太沒出息。不過他是倚賴慣別人的，其初有諸葛武侯撐持一切，他什麼也不操心。這次突然重大的事變降臨，手足無措，祇有倚賴譙周，譙周的獻策，第一是降，第二是降，第三還是降，他還有什麼辦法呢！這樣，譙周先做了「亡國之臣」，後主便不能做「非亡國之君」，

假使，譙周換上一個東吳魯肅似的人物，阿斗皇帝，在歷史上一定會改了面目。

我對阿斗惋惜，可憐！對譙周祇有鄙惡痛恨。

## 十二 論三國中兩個女性

三國人物裏面，女性雖然並不多，但也有幾個是顯著的，不過這幾個顯著的女性，無論在三國誌和三國演義中，都沒有詳細的敘述和渲染，我們祇能從簡略的記載裏，捕捉她們的輪廓來加以推論。

第一個記載得較有聲色的女性，自然是孫權的妹妹，劉備的太太，孫夫人。

什麼劉備過江招親，什麼賠了夫人又折兵，已經是成爲了膾炙人口的故事了。這一樁婚姻，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是政治的結合，而不是愛情的結合，那一幕劇，與其說是愛情劇，無甯說是政治劇。在諸葛亮的外交政策上，吳蜀的聯盟交好是極其重視的，使節的往還，自然還怕把關係黏不牢，加上層親戚關係，自然大有助於政治；這在諸葛亮軍師的妙算中，是一件可能促成的小花樣，這位軍師，雖不是介紹人，定必是做着證婚人，盡了不少贊助主持的責任；劉大哥，平白地多添一位夫人，也樂於享受，又何樂

而不爲。至於東吳，孫權肯做劉備的大舅子，藉聯婚交好，以敦睦邦誼之外，自然還有一點美人的作用。若果說得顯明些，這是有些兒「桃色間諜」的嫌疑。這樣一來，這一幕政治喜劇，真叫做你情我願，劉大哥便給有政治頭腦的月下老人繫上紅絲，做了江東的大女婿。

孫夫人很明白這種關係，她的獻身於劉備，也就是獻身於自己的朝廷，這種女性的忠忱勇氣，至少是值得讚美的。

她做了劉家的媳婦，時間雖不算長，但也有二三年之久。劉備在公安時，她下嫁給他，建安十四年，至劉備入益州，（建安十六年）她就回國，她似乎始終不忘記她政治的立場，她時刻聽着祖國的呼喚，以祖國爲第一，沒有以夫妻的私情影響她爲祖國的奮鬥，這裏，我們可以從許多事實來證明：

「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趙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行，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趙雲傳）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諸葛亮語）」

」（法正傳）」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同上）

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已可知孫夫人是什麼一種女性。東吳孫氏一門，個個都是英俊，孫夫人「有諸兄之風」，才捷剛猛，自然是一位女中巾幗。所謂才捷剛猛，却也真道得的當，你瞧：她在閨門內外，都叫侍婢執着武器侍立，連身經百戰的劉備，也出入凜凜，這位女英雄的剛猛作風也就可想了。她趁着劉備西行，外家派舟船來接她，竟想內應外合挾持阿斗回吳，來做人質，她的才捷和具有政治頭腦，也不能不使人敬佩。

大概孫夫人到蜀後，她是時刻都想施展她的政治作用的；從諸葛亮所說的「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這一句話想來，已經包涵有許多事迹，以一個離家國千里遠嫁異地的女性，居然全無半點畏懼，並且威風十足，聲勢奪人，豈是一般平凡女性所能

及。她帶來許多吏兵女婢，無異是一支遠征軍，這裏面大約并不單是一些小兵，也許掩藏着許些智勇的官將，來幫助她一切。

這樣，我們想像得到這一種婚姻結合，就并不怎樣綺旖溫馨，她和劉備同床異夢，她的犧牲色相是爲了國家，劉備那時已經是五十內外有了幾個妻室的人了。

如果將她比之於歷史上好些皇室公主下嫁異族那種「和外」政策的例子，則漢王昭君、唐文成公主之類實遠不如孫夫人。她們給予後人的印象，是一個悲劇的場面，而她，却是一種有聲有色的壯舉。她們的遠嫁異族，無非是一種消極的政治作用，而她的任務是積極的，需要一個有智勇的女性才敢担当得起。

三國的女中人才，孫夫人可算得第一位。雖然她的任務沒有完成，但進退自如，聲勢顯赫，總沒有辱沒國家所給予她的使命，由於她的來蜀，幾乎使內廷受到威脅，劉備惴惴不安，動員到趙雲，法正，張飛等文武重臣，處處提防，就是這一點，孫夫人也真足以自豪。

第二位是諸葛亮的太太，那是一位賢妻良母的典型。正史上並沒有提及她，在「襄陽

記」裏面（裝松之注引）祇有這麼一點記載：「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河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鄰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從這段記載，可知這位諸葛太太生得很難看，黃頭髮黑皮膚，這一副尊容大概當時都沒人願意問津，她的父親自己向孔明開口，一說就合，趕忙把她送過門，這倒是速成科。這樣看來，似乎孔明沒有經過什麼考慮，其實不然，孔明既說「擇婦」，對婚姻也不一定馬虎，鄰里笑他擇婦竟得醜女，可見他是經過相當時期「擇」過的，他的擇婦不重在貌而重在才，這是他的擇婦條件，所以黃承彥才敢自己當面說親，說明他的小女貌醜而「才堪相配」。孔明何以不願意討一位摩登美貌的太太呢？這也是顯然的，他的志向在於偉大的事業，淡泊寡慾是他的素養，祇要一位賢內助就夠了，他倒怕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太太糾纏着他。孔明結婚的日子大概總在二十七歲以前，二十歲以後這幾年，我們也不必去考證它，反正他在隆中尚未出山的時候，他就把這一件大事了結了。

這一位才女，究竟她的才能怎樣能和孔明匹配，我們也尋不出正面的事實記載，然



而，從其他事實的映托，諸葛太太確是一位賢妻良母之才。第一，諸葛出仕以來，身當大任，昕夕勤於國事，家裏自然照料不到，他也不願以家事爲重，這其中，治家撫子，自然都是太太擔當，使諸葛亮無家室之憂，得以盡瘁國事，賢太太內助之功不可沒，她了解自己丈夫的事業懷抱，在諸葛亮的事業成就中，也就附有太太的一份功勞。第二，「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畝，子弟衣食，自有餘饒」。桑田大概都是諸葛太太經營的，桑八百株，田十五畝，不多也不少，使生活粗安，但家無餘帛，這尺度就不是一些驕奢貪懶的官太們所能做到的。第三，諸葛亮身常在外，子女教養，自然都由母教。（諸葛祇能寫寫信教訓兒子）觀之於諸葛瞻的品學俱全，後來能夠盡忠殉職，慈母的家庭教育可知。

### 十三 論諸葛的外交與軍事

三國鼎立之局，魏國最強，從蜀漢的立場來說，魏是大敵，「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對魏是不能有所妥協的；認定魏是主要敵人，就必須聯吳以對魏，一來免樹多敵，二來可以杜絕魏曹各個擊破的蓄謀，並且增強對魏的力量，這是武侯聯吳外交政策的原因，在當時客觀形勢要求之下，聯吳政策是一種正確的政略。

隆中獻策，武侯就已有「外結好孫權」的意見，及至出輔昭烈，主持大計，這種政策，武侯是始終抱守不移。赤壁一役的大捷，可說是完全借東吳的力量奠定蜀漢立國的基礎的。當昭烈為曹操追擊，倉皇逃至夏口的時候，正是徬徨莫措，甚至想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據裴註引江表傳）武侯便當機立斷，對昭烈說：「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那時正好東吳派遣了魯肅致弔劄表，魯肅是東吳方面極力主張聯蜀外交政策的。這樣，武侯和魯肅便安排下同盟之策，開始敦睦兩國的邦交。

第一次使吳的專使，是武侯親身出任的。那時孫權兵駐柴桑，正在觀望成敗，武侯見了孫權，先陳利害：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斷，禍至無日矣。」

這番話自然是有意刺激孫權。其後他才說出同盟合攻，可操勝券的道理：

「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蹙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於是聯盟之策定而有赤壁的大捷。隨後，更再進一步，昭烈和孫權締結了姻好，然而就在這時候，因為「共同取蜀」的問題，昭烈拒絕了孫權的要求而發生了和好的裂痕。

自然，這種外交的結合，是不能不各自爲利害打算的，但是昭烈太過於重視一時的利害，往往「小不忍」而不能澈底容納武侯高瞻遠矚之見的聯吳政策。

我們爬梳史實，顯然會體味到昭烈始終並不重視這種聯吳政策，而在昭烈之下的羣臣，擁護和反對聯吳政策的也分成兩派。關羽，張飛，以至殷觀（荊州主簿，後以孫權要求共同取蜀一事獻議昭烈以爲不可，升遷爲別駕從事。）等，屬於反對派。費禕，法孝直，趙雲，秦宓，鄧芝，宗預等是屬擁護派。終於因爲關羽的和東吳不協，東吳爲曹操所離間，關羽被呂蒙襲殺，昭烈憤然東征，便中斷了武侯的聯吳大計。

荊州之失，由於關羽之亡，關羽之亡，由於對吳的不和協，而使關羽守荊州的却是昭烈。那時，關羽以銳勇之氣，大敗曹仁，聲威赫赫，甚至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倘苦利用這種時機，加意和東吳聯絡，專力向魏，局勢發展正未可量，但是關羽不能了解聯吳的重要，反以此自驕，對吳蔑視。蜀志關羽傳裴松之注引典略云：「羽圍曹，權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以其輕已，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

往」。又蜀志關羽傳載：「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從這些事實看來，關羽對吳的自大輕視可以想見。

一誤再誤，呂蒙襲荊州，關羽敗亡之後，昭烈出師東征了，當時孫權曾致書謂和，昭烈不答應，趙雲加以諫阻。裴注引趙雲別傳：「孫權襲荊州，先生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制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兇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僭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秦宓也陳：「天時必無其利」。昭烈把他幽閉起來。（見秦宓傳）這一大錯的鑄成，武侯是有難言之痛的。後來昭烈兵敗而歸，武侯慨嘆地說：「使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可見武侯對聯吳政策的如何堅持。

昭烈既斃，武侯輔孤受命，國家安危繫於一身，他又廣續與吳和好，遣使聘吳。這一次的使節是鄧芝。在先，武侯以初逢國喪，幼主繼位，正深慮東吳方面會有什麼異動，鄧芝對武侯說：「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武侯答：「吾思之久

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是誰？」武侯曰：「即使君也。」於是鄧芝負起使命赴吳。果然孫權正在狐疑，有傾向魏之意，沒有依時見他。鄧芝上了一張表，內說：「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孫權才接見他，表示甚願和蜀通好，但以蜀主幼國小，恐怕爲魏所逼，不能自保，所以他很猶豫。鄧芝對曰：

「吳蜀兩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叱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孫權聽了這番話，便默然不語，打斷降魏之意，和蜀連和，從這點事實來看，武侯的所以要時刻爭取東吳，就是恐怕東吳連魏，吳魏一旦相連，蜀勢更受威脅，這是武侯爭取與國，注重聯吳理由的所在。

孫權僭稱帝號，當時蜀中羣議與吳絕盟。但武侯還是一本其一貫外交政策，說：「權有僭逆之心久矣。所以略其愛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更當移

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甚多，將相緝穰，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北之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武侯的聯吳，自非感情用事，他權衡利弊得失，爲國家大局遠慮，不以小不忍而亂大謀。終於派衛尉陳震（孝起）赴吳慶賀。

陳震到了江東，一入吳界，便先致書守關官吏，申明敬賀並共結盟友同心討賊之意，孫權和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涼、屬蜀。這一次並且是結了軍事上的攻守同盟。在盟詞上提到：「自今日漢吳旣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較前者口頭上的盟約，似乎更深切一層了。

由於蜀吳兩國的續訂盟約，魏兵不敢南窺，武侯北伐之師才能大舉，具見武侯政策收獲的效果。統計前後外交使節赴吳，達十餘次，費禕於南征後也曾使吳，除鄧芝、

陳震外、宗預，伊籍，也是著名的使吳外交家，而東吳的張溫也曾幾次奉命使蜀。是東吳外交界的傑出人才。

吳蜀的外交關係，從東吳方面看，我們不能不提魯肅這個人。東吳了解吳蜀同盟的重要性的，祇有魯肅。武侯在蜀方面主張聯吳，魯肅在吳方面主張聯蜀，武侯和魯肅，在這種外交見解上，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

當昭烈奔到江夏時，魯肅就把昭烈拉攏了。他勸昭烈結好於吳：「今爲君計，莫若遺心腹使自結於東吳，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昭烈的借得荊州，也是魯肅在孫權旁邊慫恿的，所以後來孫權批評魯肅說：「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呂蒙傳）而魯肅和關羽爭三郡的時候，委曲求全，對羽忍讓，就是怕影響到「吳蜀同盟」的破裂，魯肅傳載：「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款好撫之。」可知魯肅的顧全大局。

魯肅何以極力主張聯蜀？他的見解也就和武侯一樣，以爲曹操才是東吳的大敵；吳蜀必須「共拒曹公」，「多操之敵」，他也是估量客觀形勢的需要，公忠體國爲國家前



途着想的。假使當日不借荊州，予昭烈以建立勢力的地盤，多操之敵，東吳也許不能撐持如此之久。

武侯聯吳，並非對孫權有所偏愛，他們洞悉大勢，政見相同而已，魯肅死時，據說武侯在蜀爲之發喪，這對他絕無其例，爲什麼武侯那樣尊重他，這並非由於他們的私誼，而是將魯肅作爲蜀漢的一位親摯的朋友，因爲魯肅是盡力於蜀吳的和平邦交。

然而，東吳的孫權，對聯蜀也並不重視，這和昭烈並不重視聯吳相同，東吳也有呂蒙這些人反對聯蜀，這也和關羽不願意聯吳相同，蜀吳同盟，成於武侯和魯肅，却破壞於昭烈，關羽，和孫權，呂蒙。

關羽威震華夏時，司馬宣王，蔣濟等對曹操獻議說：「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果然孫權陰誘芳仁，等到關羽出師歸來。呂蒙便據了江陵，襲害關羽，曹操所以能運用這種反間之計，使吳蜀火併，解除「徙許都」的威脅，就是看中了孫權這種弱點。

呂蒙是一個急功好勇的軍人，他和關羽一樣也蔑視吳蜀盟好的重要性。他對孫權說

：「羽君臣於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僂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於是撲滅關羽，襲據襄陽，當時魯肅却向孫權這樣諫阻：「肅等以爲曹公尚在，禍難始備，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呂蒙傳）但孫權却沒有聽他。孫權和呂蒙不了解削弱蜀的力量，無異使魏坐大，魏力量坐大，對東吳只有增加威脅，於魏有利而於吳有損。

我們今日看到這段歷史，覺得很替武侯可惜，假使關羽當時不這樣驕於自大，能執行武侯的政策，不致釀成孫權呂蒙的忌憤，從而聯合北攻，曹阿瞞或竟就塌下台來也未可知，但是，由此我們也更可以了解武侯的苦衷，和他外交政策的絕對正確。

至於武侯的軍事，六出祁山，北伐的軍事計畫終於沒有如願完成，就盡瘁死去，因此有些人以「成敗論英雄」的眼光來判斷，就說武侯祇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却不是一個成功的軍事家。這種批評，也是有它的理論淵源的，就是陳壽的評語：

「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

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一。

要說武侯短於將略奇謀，那是過低評價武侯的軍事才能。固然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要比軍事上的成就爲大，但以當時的客觀形勢而論，他的軍事策畫與戰略，也是正確而優美的，陳壽並非不了解武侯的人，也並非不了然當時蜀漢局勢客觀環境困難的人，所以要在將略奇謀上不得不稍抑武侯者，大概是爲了應付當時的晉帝，因爲陳壽究竟是晉室的著作郎，而武侯正是司馬懿的敵手，不能不有所顧忌。所謂「或值人傑」，所謂「天命有歸」，都是對晉室的諛詞。

實在，武侯的六出祁山，前五次都是一種「以攻爲守」的戰略。最後一次的從斜谷出師，據武功五丈原，和司馬懿對壘於渭南，並且分兵屯田，才是真正準備大規模的攻，而這一次武侯却未捷先死了，於是後世的人，就以爲他六次北伐都歸於失敗。其實前幾次的出兵，如果戰略是眞攻，也許可說是沒有成功；但戰略是以攻爲守，便已達到了

作戰的目的，不能說是失敗。

「中國之命運」中曾論及武侯的功業說：「十二年間，在軍事上以攻爲守，在政治上以猛濟寬」。對於武侯的戰略就早加闡明。武侯之所以要採取這種攻的守勢，以致所謂「連年勦衆，未能有克」，是當時客觀形勢決定所使然。蜀的力量，在任何時都比魏爲弱，而在基礎未穩定，內部種種建設未完成之時，實在不能談到北伐，但一方面積極建設內部，修明政治，充實倉廩，一方面却不能不振軍事上的聲威，以杜絕敵人的覬覦。武侯的屢次師出祁山，就是這種用意。並且不斷的出擊，也可以藉此來訓練部隊，使士卒習於戰鬥，不致逸樂喪志，以作日後的大舉。至於直搗中原，掃除奸醜，復興漢室，乃是武侯軍事計畫的最後目的，也是政治計畫的最終目的。若果僅從他的幾次佯攻，而認爲他「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甚至批評他「空勞師旅，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似不足以知武侯宏遠的軍事大計的。

我們且敘述一下六次的北伐：建興三年南征凱旋之後，至五年，武侯率軍北駐漢中，六年春天，揚言從斜谷道出擊，使趙雲、鄧芝爲疑軍。自率部隊攻祁山，南安、天水

、安定三郡叛魏響應，魏命張郃迎戰，武侯使馬謖做前鋒，戰於街亭，爲張郃所破，使退軍還漢中。這是第一次。到了那年的冬天，東吳的孫權擊敗曹休，魏兵東下，探知關中空虛，武侯又出師圍陳倉，魏派曹真相拒，蜀軍糧盡引還，魏將王雙追勦，蜀軍回頭迎戰，斬了王雙。這是第二次。建興七年，武侯遣派陳式出擊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領擊式，武侯自出至建威，郭淮退還，便平武都、陰平兩郡。這是第三次。建興八年，魏使司馬懿、張郃、曹真三路來攻漢中，武侯拒之於城固，適天雨；魏軍引去。這是第四次。建興九年，武侯復出師祁山，圍之。司馬懿自荊州朝魏，明帝叫他屯兵長安，率張郃、郭淮等相拒，司馬懿不敢出戰，諸將屢請，武侯大破之於鹵城，糧盡退軍，殺追張郃。這是第五次。到了建興十二年，其間已經休養了三年，武侯息兵勤農，養精蓄銳，作木牛流馬，又作第六次的北伐，和司馬懿相持於渭濱，屯田爲久駐之計。相持不久，武侯便在軍中死了。

從這幾次的出師看來，拔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之民以歸。平武都、陰平二郡。斬王雙，殲張郃，挫司馬懿。也不能說沒有相當收穫。蜀都基礎能夠安定數十年使外國軍

固，敵人不敢進窺，就全在以攻爲守的戰略，當時武侯的決策是攻而能克，固所冀望；攻而不克，也可守而待時，這是戰略的上策。試看武侯死後，魏軍果然就從陰平進襲，以至蜀局不能保守。那麼，祁山的出師，豈能說是「空勞師旅」！

假使最後一次的出師，武侯不是那麼早死，魏、蜀勝敗之局是難以判定的。因爲這一次的出兵，武侯已經解決了一個最嚴重的難題，就是糧食問題。武侯所用的方法。分兵屯田，這是一個解決軍精困難，可以持久作戰的辦法。屯田的好處，第一，是克服軍糧運輸上的困難。第二，是戰不廢耕，兵士也可接近民衆。第三，是勝可以進，不勝可以守。正所謂穩紮穩打，步步爲營。我們知道武侯若干次的出師，都受掣於糧運，往往「糧盡引還」。這正是武侯以前幾次出師軍事布置上的唯一缺點。由蜀出兵至陝、甘地帶，千里迢遙，其時既無良好的交通工具，軍運自然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然而古今行軍，軍糧軍實的有關大局的勝負是一例的。武侯受限於地勢，在軍事運輸上布置未周，給綏線聯絡不佳，致軍事計畫往往受阻，即使他竭盡巧思，想出木牛流馬這些方法來運糧，但小巧的玩意仍然不能收大效。因此。司馬懿應付的戰術，就老是堅壁清野，按

兵不戰。可是最後一次的出師，分兵屯田，他把這難題解決了。蜀書諸葛亮傳說：「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分兵屯田，怕是軍無紀律，擾害百姓，以武侯治軍嚴整，「百姓安堵」，自然是實情。這一次，司馬懿可有點着慌了，他知道武侯食少事繁，祇好希望武侯早死。

司馬懿的軍事才能，在三國人才中，也算得是第一流的。他對於武侯，嘴裏雖然還要說「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但實在是敬畏之至。武侯去世，蜀兵引退，司馬懿不敢追擊，於是有「死諸葛嚇走生仲達」的俗諺。退兵後，司馬懿按其營壘處所，稱爲「天下奇才」。陰平一役，武侯的大兵，給魏延帶去，只剩得一座空城，司馬懿軍臨城下，却不敢闖進。武侯師出祁山，司馬懿一敗之後，「畏之如虎」。又，裴氏語林載：「渭濱將戰，懿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懿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武侯的將略奇謀，在當時敵對的司馬懿的心目中，還這樣的尊崇贊許，後人又何可疵議。

論者或以爲最後一次的出兵，魏延建議由于午谷直搗長安的戰術，較之武侯西出祁山趨秦隴的定策爲優。因爲長安不下，雖得秦隴，也不能動搖魏的基礎，而那時守長安的夏侯楙，又是懦夫，正好攻其最弱的一環。但是武侯不從。據魏書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魏延的建議，本是用兵的道理，不能說不對，就是起初武侯對昭烈的陳策，也說過：「天下有變，命上將出宛洛，自嚮秦川。」直攻長安，倘能得手，本可事半功倍。但這種作戰計畫，武侯並非不懂，所以不從的原因，大約是：第一，那時的形勢，已經不同於隆中對策的所料，關羽失去襄陽，奇兵取長安，已失倚角之恃。假使夏侯楙不致如魏延所想的棄城而逃，或戮力相拒，出奇挫銳，或堅壁清野，閉關苦守，那末，延軍深入，亦有招致敗覆的可能。第二，武侯用兵一向謹慎，尙正兵而不尙詭謀。直搗長安，雖可僥倖致勝，却不是有十



全的把握。他說：「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而武侯的定策，就是步步爲營。逐漸推進的「十全」辦法。因爲屯田的計畫，是準備作持久戰的，西趨秦隴，終可達到目的，何必行險以圖急功近利，這是武侯軍事上的一貫穩健作風。

陳同甫的「酌古論」裏，對於武侯的將略是推崇備至的。並且他以爲：「孔明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禱樂可興。」他又比較武侯和司馬懿的優劣，說：「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勳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彼豈孔明敵哉！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飢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運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之則敗耳。……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間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驍兵者固有以窺之矣。」雖是養生之論，所見却至有道理，我們可能相信武侯避死數年，統一大業，定會完成於

他的手中。

至於「平蠻」戰役和「赤壁」戰役，也是武侯軍事上的大成就。平蠻一事，我們另章詳述；赤壁一役，雖然是東吳合力擊曹，但一切軍事計劃，多由武侯策畫，以吳、蜀極少數部隊，迎擊曹操水陸大軍八十萬，把曹軍打得落花流水，借孫權的力量，取荊州以作建國的基礎，這一戰役，關於蜀局甚大，而武侯實竟其功。

至於「治戎爲長」，任何人都對武侯敬佩。武侯治軍之道，賞罰嚴明，以信義昭示大衆，所以將士用命。有一次，和魏軍司馬懿對陣，正要調防，參謀的人以爲敵衆勢強，非力所及，不如將調防休養的隊伍停留下來，以壯聲勢；武侯說：「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仍然催遣他們回去，這樣一來，調防的隊伍，都願意留在陣地一戰，駐兵也奮勇效命，大家說：「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各人拔刀爭先，以一當十，就在這次打敗了司馬懿，殺了張郃，這個故事見於「郭冲五事」。也就說明武侯如何的待軍以信。

後人描寫武侯的行軍情況，有這樣的說話：「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其兵出入，如寶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

而蜀地兵少，武侯對於部隊的擴充與編配，往往徵集各地分子雜合而成。拔南安等三郡時，大概兵源補充不少。武都、陰平兩郡，其地有氐羌；陳飛討平時，也有羌兵入伍；後來北伐之師，羌人士兵算多。南征凱旋，也選定了許多勁卒。這樣，武侯軍中的質數至爲複雜，既有羌蠻，蜀兵又素稱輕脫，這種質數複雜的軍隊，本來很不容易訓練和控制，但武侯不但使之成爲勁旅，指揮如意，並且人人用命；概見治軍的有方。

除木牛、流馬、連弩這些巧思的軍備發明外，有名的八陣圖是膾炙人口的。所謂八陣圖，想是練兵的陣式。據說武侯以前也有八陣之法，竇憲曾用之以擊匈奴。唐李靖製有六花陣。唐太宗也不了然，便問：「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見李昭玘的「八陣論」）。現在公園裏常有遊戲式的八陣圖，以竹桿與間格，曲折多端，入不知出，不知是否

仿自武侯的八陣圖？總之這種兵形陣勢，在以前是一個巧妙的陣法，武侯的精於兵陣，自不待言。

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武侯遺集中，有關於軍事理論方面的著述，如便宜十六策中的第九治軍一章和將苑五十篇。

治軍一章有云：「治國以文爲政，治軍以武爲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禮化，易以威服，禮有所任，威有所施。」這就是武侯平蠻南征的理論發揮。又云：「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衆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衆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彊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處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擒敵之勢，此爲軍之大略也。」這一大段理論，也足證明武侯用兵的如何謹慎，治軍的如何嚴明。

將苑五十篇，對於做將帥和用兵的道理，列舉甚詳。那簡直就是一本「武侯兵法」從上述的探討，武侯在軍事上的實踐與理論方面，雖然並不如陳壽所說的將略非長

，奇謀爲短。武侯的戰略是決定於他的政略而來的，看他政治措施之盛，也就覺得他的理民優於將略。武侯的用兵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尙奇兵詭道，也就覺得他奇謀爲短。在任人選將方面，自然也不免偶而失策，例如，誤用馬謖、李嚴，因而有街亭之失，和糧運連誤之事。馬謖雖是「才器過人，喜論軍計」。但他畢竟是一個軍事理論家，而不能做行軍的將帥，和張郃戰於街亭一段，武侯派他傲前鋒，在前方督領諸軍，結果給張郃殺個大敗，士卒離散，軍事大計受了極大影響。李嚴行事不忠，武侯再出祁山時，派他在漢中督導糧運，因天雨恐糧不繼，竟至矯旨命武侯退師，其後將過失推諉給別人，使北伐之師又受一次阻礙。然而這種任人選將上的一點小疵，不能就說武侯將略非長，即使一個超凡卓絕的軍事家，他也不能樣樣都十全十美，更不能不許有一點失敗。

古代文武合一，所謂王佐之才是必須文武兼資的。武侯以文武之才。並膺將相重責。在政治上，他固然是一個卓絕的大政治家，而在軍事上，他實在也是一個卓絕的軍事家。

#### 十四 論諸葛的現實主義的政治與政策

武侯的隆中對策，分析天下大勢是那麼的明晰，提供的建業大計是那麼的確切，那一席話，早已說明了他的整個政治主張和政治策略，並且充分表現了一個大政治家的遠見與宏抱。

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是復興漢室。這是鮮明的政治口號，也就是後來所說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一貫主張。

他所決定的政略，歸納起來，就是「據蜀和吳」，「安內攘外」，和「平蠻伐魏」。這也可說是武侯建業的三策。第一策的「據蜀和吳」，是建立根據地和尋求與國。巴蜀土地肥腴，鹽糧充足，可以自給自足，並且「益州險塞，劉璋闇弱」，正好佔據這一重要資源區域和軍事要地，作為立國基礎。這是武侯高瞻遠矚的卓識。至於聯絡東吳，一面借為外援，一面免樹多敵，聯吳的外交政策也是絕對需要的。第二策的「安內攘外

「，是充實國力，先謀內政修明，富國強兵，然後才發動對敵攻勢。第三策的「平蠻伐魏」，可謂屬於軍事攻勢的戰略，爲了北伐必須先鞏固四川外圍，「西和諸戎，南撫夷越」，道理就在鞏固外圍，滅除後患。然後傾師北伐，進取中原，掃除寇氛，復興漢室，這是武侯建業的最後一個目的。

武侯二十多年的盡瘁心力，諸所策畫，都是本着這既定下的三策而努力：建安十九年，劉璋降了昭烈，便據有蜀都，取得根據地。但蜀地雖「殷盛豐樂」，却是一個「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地方。當時人心初附，處理千頭萬緒，而武侯首重人事的安排，昭烈傳載：「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這顯然是武侯安定人心量才器使的做法，使蜀局很快便穩定下來。聯吳外交政策在當時客觀環境上殊有必要，我們另章評述。武侯既實行了第一策，建立了根據地和確定了外交路線，於是盡力於第二策「安內」的進行。在佔據益州以後，因爲劉璋治蜀，失之閻弱，政治未能上軌道，弄得一團糟，武侯花了大部時間從事革新，勵精圖治，並

作富國利民的措施，使民生穩定，邦基固立，以準備向外發展。史稱武侯的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又稱：「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凌弱，風化肅然」。據說武侯當時的銳意建設，是「下至橋樑、道路，井竈圃園，無不修繕」。可見那時的交通、路政、公共衛生等都有一番建設。這些「安內」的政治上的刷新與建設，總括起來，正如陳壽所說的「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武侯對於這些行政的孜孜盡力，就是因爲他要「物理其本」。政治建設是一切建設的本。他若干年來以苦幹精神實現他的安內政策，才能使蜀漢屹然立國，與強魏、富吳鼎峙於當世。第二策成功以後，武侯便執行他的第三策「平蠻伐魏」。平蠻所以綏靖邊患，使北伐無後顧之憂。五月渡澧，七擒孟獲，在軍事和政治雙管齊下之後，終於解決了邊患的難題。於是武侯第六次出師祁山，要達到他最後而且最大的一個目的——北伐以完成大業。可惜這一策的下半



段，最關重要的一著，剛在開始實現而武侯便去世了。其後，祇使我們有「人亡政息」的慨嘆。

武侯的政治思想，仔細研究起來，他既不是純然宗於法家，也不是純然拘於儒家。從他的政治措施來看，他的政治哲學可說集儒法之長，王霸之道的大成。儒家重人治，法家重法治，武侯治蜀，兩者均重。王道言仁義，霸道言利害，武侯輔蜀，張仁義而顧利害，兩者兼顧。

這也是時勢所使然，在那時羣雄角逐、危急存亡之秋，單是儒家的王道仁政，是不能應付局面的，治亂世用嚴刑，這是法家應時的良劑。所以武侯治蜀，不能不「以猛濟寬」。

蜀記裏載：「益州承劉璋闇弱之後，士大夫多挾其財、勢，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巨室不便所爲，多怨譴者」。當時法正也以爲太過嚴峻，曾向武侯相諫：

「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懷其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治新國，未垂惠撫，且主客未習，宜稍稍寬假，以安反側之心。願緩刑弛禁，以慰民

望」。

但武侯的答復是：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所以弘濟。今劉璋闇弱，自其父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令不行。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濫；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緣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法，爲政之要，於斯著矣」。

這一段話，就是武侯「以猛濟寬」的理論。

又：華陽國志載：「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這也是武侯治蜀的一事例。

武侯這種嚴峻的法治，在當時是收到良效的。然而，此中我們不能忽略的，就是武

厲行猛政，却是「賞罰嚴明」、「公爾忘私」的，所以使人信服而無怨言。

「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這句話正表現着武侯是如何的公正無私。馬謖、李嚴、廖立都是他賞識的人，但一有過失，絕不徇私，處罰如法。馬謖的失街亭，甚至武侯自己也上表呈請處分，說：「街亭之失，咎皆在臣，春秋責帥，臣職是當」。這種秉公的態度，自然使人無所間言。當時張裔有幾句話批評得最好：

「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愈亡其身者也」。

此外，武侯對於民生方面，備極措意，處處爲民衆利益着想，所謂「下至橋梁道路，并隘圃溷，無不修繕」。這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兌現，所以法令雖嚴，而人民還是服威感德。

武侯一方面重法家的法治，一方面也未嘗不重儒家的人治。

他的便宜十六策中「舉措」一章，曾有兩句名言，就是：「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治」。可見武侯是如何的重人任官。

武侯的用人一以才能爲準。蔣琬是承繼武侯擔當大任的人，在卑位時武侯便認識他的能幹，向昭烈推薦，史裏載着的故事是：初蔣琬在廣都那一個地方做縣長之類的小官，昭烈一天到了廣都，蔣琬却不理公事，並且喝得醺醺大醉，昭烈大怒，將要殺他，武侯說：蔣琬有治國的大才，不是一位小地方官的才具，他的爲政，以安民爲本，不會粉飾敷衍，請昭烈加以明察。昭烈才不殺他。

武侯的知人，曾說明他的幾個方法，見之於他所著將苑五十篇之一的『知人篇』：「夫人之性，莫難察焉。萬惡雖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無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而觀其變；三曰，治之以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武侯自己的躬校簿書，我想也有點爲「人治」示範的作用。而蜀漢的人才也究竟少，楚士輕浮，蜀士躁脫，大小事集中於武侯一人，從軍事、政治、經濟以至瑣事，也都

躬自親爲，以分層負責的觀點來批評，楊顯的諫阻是對的；但武侯的察於纖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試想，任李嚴而李嚴亂其紀，任馬謖而馬謖敗其功，武侯雖知人善用，而所能用者究竟是少，以李嚴，馬謖的才，還使武侯吃了大虧，他不能不特別謹慎。

至於武侯的政治哲學的屬於王道還是霸道。歷來諸家的批評，也見仁見智。有人比之於伊尹、周公，有人也比之於管仲、蕭何。主張儒家王道政治的人，也有人以爲武侯尙不能繙然行乎仁義。也有人以爲武侯終是儒者氣象，有聖賢之心。

譬如武侯勸昭烈取劉璋，據益州一事，衆說頗見紛紜，習鑿齒、蘇東坡和程頤，認爲這是霸道。朱熹、陳諒、張栻等，認爲這還是仁義之心：

習鑿齒：「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持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具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

蘇東坡：「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此諸葛之所以失也。……劉璋遷蜀，既已失天下仁人義士之心，其後治軍整旅，馬驅東轡，而欲天

下嚮從，蓋亦難矣」。

程顥：「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劉則可也」。

又：「問文中子謂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諸葛武侯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武侯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使你，豈可苟爲」。（近思錄）

上述幾家的批評頗以伐劉璋一舉爲不仁義。但另一種相反的批評是：

朱熹：「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

陳諒：「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孔明，伊、周之徒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託孤，不折不懈，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而上

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主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成」。〔酌古論〕

張栻：「予旣作武侯傳，新安朱元晦以爲不當抹去管、樂自許事，又謂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業，未免雜霸。予曰否否。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豈能逆視』。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

前者的批評，斤斤以取劉璋爲不義，未免近於迂腐；後者的批評，必須將武侯納入儒道，連以管、樂自許的自道，也爲之抹煞，也近於武斷。總之，這都是主觀的批評，武侯在當時倒未必要將自己編入那一流派，他只是就客觀形勢來措施他的政治主張，假如說武侯並無一點霸道，但他自己就向昭烈說過「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的話。假如說武侯完全是管、樂、申、韓一派，則他的仁政甚多，並非純尙刑法，他的政治口號，也有

「王業不偏安」之語。並且，劉璋一事的義與不義，卽就儒家的立場來說，也未必就有定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利天下，也可說就是仁義的用心。武侯之志在興蜀，興蜀所以復漢，這樣，取劉璋，據益州，其利不在一己而在天下，以儒家觀點論，又何不義之有？

武侯仁政的措施，其實很多，雖則他的吏治是嚴刑峻法，但對民衆的仁愛之心是顯然的，有一次師出祁山，隴西、南安、天水三郡響應，到了退師的時候，拔三郡之民數千人以歸，大家都以此爲賀。武侯憂戚地說：「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膾，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武侯拔三郡的老百姓數千人歸蜀，是恐怕魏人會懲治首事的老百姓，連累他們受罪，這是一片愛民的仁心。所以朱熹的批評是：「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膾』，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疑附之略也，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

總括言之，武侯的政治思想，倒並不單主一家，在前章我們說過，少年的武侯在爲



學方面就博涉諸子百家。他的政治與政略，在適應環境的需要，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大凡建非常的功業的，自非規行矩步的酸儒所可企致。取劉璋，據益州，在當時客觀形勢上有此必要，站在政治鬥爭立場來說是無所謂義與不義的。治蜀的採取法家精神，也在適應當時的環境。我以為杜甫有兩句詩推崇武侯恰到好处，就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武侯的確是伊、呂、蕭、曹，兼而有之的。

在「中國的命運」中，論武侯的政治，謂為：「在政治上以猛濟寬，以討賊雪恥，激厲國民的志氣；以循名責實，糾正浮華浪漫的風俗」。批評得至當。

討賊雪恥的政治口號就是「漢賊不兩立」。武侯以此激厲國民的勇氣。奮發獨立雪恥的精神。因為蜀漢在當時為至弱小，無論魏據中原，佔據六州的地盤，視蜀為不足道；就是東吳保有江東，兼跨荆揚，地大財裕，也較蜀為盛。武侯的政策，首在激厲士氣，鼓動民心，使認識正義所在，養成自尊心而伺仇敵愾，時刻以仇恥二字教民，警惕國民有敵無我，有我無敵，這種政策是積極的、進步的。試看終武侯之世，魏人祇有招架之功，却無進攻之力，其中曹真雖曾窺伺漢中，但終難寸進；司馬懿以雄譎著稱，終

生畏蜀如虎；武侯淳厲國民，組訓民衆的工作，不可謂不收大效。

武侯討賊雪恥的激昂言論，到處可見。後出師表說：「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武侯固不僅常發討賊圖強的言論以鼓勵國民，這也是他由衷的志願。可笑的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等，有一次，曾經妄想說服武侯，「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武侯置之不理而作正議一篇：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察，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蒼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疎稱莽之功，亦將信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述舊基，奮厲卒數千，摧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誘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譎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

藻，煩榮翰墨者矣，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

篇中以王莽例魏曹，處處申述漢賊不兩立之旨，義正而詞嚴，使人振奮。

又：軍誠有說：「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死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軍誠大約是軍中的訓詞之類，武侯不但教民以戰，並且使他們知道爲何而戰，討賊「臨有罪」是他們戰的原因，這真可說是「明恥教戰」了。

至於循名責實，是武侯施政的不稍苟假處。武侯是一個苦幹，實幹的政治家，他的行事，尚實行而不崇虛文，敷衍粉飾，是政治上的大毛病。漢末東治的風氣，朝政衰而士風浮，公卿大夫，因循苟且，粉飾太平，以苟全於威官擅權之世，武侯深知這種不良風氣，並且又在「德政不舉，威令不行」的劉璋統治後的蜀都，越發要力矯頹風，以循名責實爲治。李嚴負責糧運不忠職守，立予革職徙廢處分；糜竺狂妄大言，臧否羣臣，也徒爲民。田師時對於宮中府中的事，一一奏明指定專人負責。甚至一件小事，一件用器，也必注意審察。他的遺著有「作斧教」一則：「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鑿刀

斧千餘枚，賴賊已走。聞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斧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武侯大小事的循名責實，往往如此。

武侯治蜀，還有一種顯明的成績，但卻沒有人注意到的，就是富國理財之道。我們試看蜀師屢出，但未聞民生憔悴，糧賦支絀，反而財裕食足，其中富國的措施，必自有道，不過史家沒有注意記載而已。所見記載的，祇說武侯南征獲捷，所獲物資不少，反而富饒起來。蜀地雖可自給自足，當仍賴開源培本有方，有人以為蜀的和吳政策，原不僥止於軍事上的聯盟，即在貿易經濟上，也有互惠作用，江東資財用足，蜀地貨物，沿長江輸出鄰國，可以增裕收入，以作軍費，這是武侯所以堅持和吳的原因之一。所言之頗有道理。

我們所認為稍有缺憾的，就是武侯沒有培養幹部的政策。或者至少是這種政策並沒強化。這就影響到蜀局的後來，而有「人亡政息」之嘆。

在武侯之世，固然是可以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但「鞠躬盡瘁」死了之後，完成他的遺志大業者却繼起無人。就是將才方面，也只有一个半路來歸的姜維，終至「廖化作先

錄」，將才也零落不繼。

蔣琬、費禕是武侯所最看重的兩個人。有這樣一段故事：「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李福）省侍，遂因諮以國事大計，福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雖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今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蒼舊雜記）。事實上，蔣琬、費禕在武侯死後，也作了繼承武侯大業的人，可是武侯剛死，在前方就發生魏延、楊儀的衝突，蔣、費等處理未見的當，終使衝突強化，內部招致損失。陳壽評贊蔣琬是「方整有威」費禕是「寬濟而博」，雖是人才，究竟才具過小，不能擔當起武侯的遺志大業，蔣、費一死之後，更不消說了。

但這裏也有一個大原因，便是蜀地人才本來就不見得多。武侯已經盡力甄拔，要想支撐這樣一個嚴重大局，是非有如武侯這樣有大魄力，大才幹的人不能勝任，自郤以下，似乎也並非純由培養所能致的吧。

## 十五 論「論諸葛亮」

近讀王芸生先生「論諸葛亮」一文，對於諸葛學養和用才等方面，雖有清新之見，但其中若干論述，似乎過持成見，稍覺偏執。不佞對三國人物的重新論衡，也有同嗜，於諸葛亦曾加以評論，爰以個人的看法，再爲此文。

首先，我以爲論衡古人，自然須有新意，論古的文章是寫給現代人看的，如果就古論古，沒有一點新意，那就變成我們從前在私塾裏所做的漢高祖論秦始皇論一樣的陳腐。從前陳龍川所寫「酌古論」的所以有名，也就是因爲他的論古是有新意之故。不過此中却有一個限度，就是，我們可以從現代人眼光去論衡古人，却不能抹煞古人的處境，不能忽視古人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環境情形、和事業措施上的客觀背景，惟能如是，才能了解古人的事功得失，也才能使議論所得的新意，更能適合而確切。假如先立一個

成見，借題發揮，勉強博會，那就不是論古人，索性來一個「故事新編」還好。芸生先生大文，新意自然是有，但似覺多用現代人眼光，少注意古人環境，持論未免太過，新意也就太過尖新了一點。

芸生先生對諸葛的學養、政治措施、養才用人各方面是先立定一個見解去認識的，就是他以為諸葛是「法道合抱」的一位政治家，與儒家不相干，並且似乎他還側重說明他的道家，因此諸葛的學養是道家的學養；政治措施，也是道家的一套治術；用人也是道家的「機心」猜忌而太顧到個人的利害，甚至小說家言三國演義所渲染的八卦道袍，也很合諸葛的身份了。我不很同意芸生先生這種看法，我所以要和芸生先生討論的就是：第一、諸葛是否「法道合抱」？換言之，就是是否就能斷定他有道家的思想與作風而與儒家不相干？第二、諸葛對於人才是否猜忌不能寬容？前一個問題，我以為芸生先生論證不足，後一個問題我以為芸生先生忽視了諸葛當時的處境和當時的人事關係，持論未見公允。試分別申論之。

## 二

雲生先生說諸葛「法道合抱」，諸葛有法家的思想與作風，大家倒也公認，且撇開不談。至於說是道家，雲生先生舉出的史證是「淡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誠子書）因而說這兩句話，就是老子的「致虛守靜，知白守黑」。這種論證，極爲牽強，淡泊明志，甯靜致遠，勉強解作「致虛守靜」也還說得去，但「知白守黑」，却不知從何比照起，「致遠」卽是養成遠大眼光，担任遠大責任，似乎并非養成城府深沉，知白守黑。諸葛一生，賞罰至明，是非辨別至清，所謂「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也很少有知白守黑的例證。并且這兩句話是教訓他兒子的，無非要他兒子靜心專志以成學，後面還有一句話是「險躁則不能理性」，足見靜字是躁字的對照，并且還反對「險躁」，并非什麼「靜心制動，清靜無爲」那一套，與其說這兩句話是道家的修養，無甯說是儒家的修養。中庸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安，安而後能得」，孟子的求其「放心」，都是要人虛心靜欲才能修身求學之意，這兩句話又何嘗不與儒家學養相合！何以必須牽傳到道家？其實淡泊、甯靜，凡是一個志在匡時救世不是自私自利的人，他都會有這種態度，淡泊的對面是利慾，甯靜的對面是險躁，去個人私慾，甯靜以



求理智，正是古今人進德修業的一種範圍。儒家尤其致力於此。譬如曾子的每日三省其身，尤非靜不能體察自己的有無過失，惟靜才能克己，宋儒也有提倡靜坐培養良知的，這決不能說是道家才主靜。又如孔子所說的「富貴於我如浮雲」，顏淵的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生活，便是淡泊去慾。這也決不能說是道家才主淡泊。

再說諸葛「與儒家不相干」，也似乎太乾脆。他輔助昭烈所提出的嚴正口號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他擁護正統，志在撥亂反正，匡復漢祚，這正是春秋大義，儒家所宗；裴松之說他「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正是他出山的懷抱，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諸葛的隱居和出處，正有這種態度。我們姑且撇開後出師表「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兩句話，但他在功業上所表現的企圖挽回大運，鋤奸建業，那種嘔心瀝血，生死已之，知其不可爲的精神，却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後出師表可以僞，這種事實所表現的精神却不能僞。昭烈臨終托孤的遺言，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但諸葛涕泣地說：「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倘若諸葛真是有「機心」的人，不信奉儒家的君臣大義，後來何事不可

爲，但他扶持阿斗，盡忠任勞，乃至盡瘁而死，這豈是有機心而不顧大義者之所願爲！至於他的政治措施，我們也不能單看他的「嚴猛」採取法家作風的一面，也要同時看他的「開誠心，布公道」，并且處處爲民生着想，以信義立國的儒家政治作風的一面。譬如事實所示：「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道不拾遺，強不凌弱，風化肅然。」和「治蜀嚴而民不知怨」豈不就是孔子所說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政治措施。諸葛治蜀的所以要採用法家的嚴猛，也還是出於環境所需要，不得不然，他對法正解釋那一番道理，說：「德政不舉，威令不行，蜀士人士，專橫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所以不得不用嚴猛，後來他又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他「治蜀嚴而民不怨」，正證明他雖用「嚴猛」的一面，却有「大德」的另一面，他的嚴猛處還是副作風，他的愛民仁政的大德，正是正作風，當時政治建設，無不以福國利民爲主，史載「下至橋樑，路道，并龜圍溷，無不修繕。」可見那時利民的一切交通，路政，公共衛生都有一番建設，使民生安定。他有一次出師祁山，隴西、南安、天水三郡的老百姓都響應，後來退兵，拔三郡之民數千以歸，大家以此爲賀，他說：

「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胎，一夫有危，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忤」。他怕連累老百姓受罪，所以披髮而歸，這是一片愛民的仁心。總之諸葛的政治措施，行儒家的仁政之處頗多，就是他所作的便宜十六策裏面治國用人的道理，也表現不少儒家的思想。似乎不能說他純是「法道合抱」，而與儒家絕不相干。

本來派定諸葛是屬於那一宗派這種說法，我也頗不贊同。諸葛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措施是最能把握住現實性的，處非常之世，建非常之業，不能囿於那一宗派，在那裏規行矩步，自設藩籬。蘇東坡習鑿齒等批評他王霸雜用，說他以仁義示天下，而又襲奪璋土，是「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很難成功，就是不了解諸葛的現實主義的政治作風，可謂書生之論。因此，我以為宋儒把他派定的「純是儒者氣象」「伊周之徒」，拉他進孔廟，不甚對。考先生又拉他入道家，更不對。諸葛的學養，政治哲學和政治措施，都注意實際，因而是多方面，換句話說，他倒不並單囿於那一家，可以說各家的學養都有，但決不能派定他是一二家的門徒，硬在諸葛的額上寫上什麼什麼家，近乎盲人摸象。我們知道諸葛於諸子百家之書無不窺，無不抉精取要，觀其大略，

後人以爲他寫過申韓六韜書給阿斗，自己少年比過管樂，就說他法家呀，道家呀，其實申韓管樂，其間也還有差別，六韜可以說是兵書。墨家以「器」見長，諸葛會做木牛流馬、連弩，說他是「法墨合抱」，不是也可以牽傅嗎？

### 三

至於諸葛的養才用人問題，我也曾這樣說過：「祇知用人而不知培養人，說得時髦一點，就是沒有培養幹部計劃。」（拙著諸葛新論，民主政治創刊號）說他培養幹部不夠，怕還算得公平之論，而芸生先生說「猜二察三不信任。又說他用人待才慣用機心，不夠開誠。這點，我也以爲太過。若非昧於當時地理環境和人事關係，便是一種成見的眼光。芸生先生所舉史實的例固然很多但大半是先從諸葛有機心這種成見去測度的。三國距今已遠，當時的實情，雖無由清楚認識，而從寫成的歷史上去探討，往往有見仁見智的不同，不過就從寫下來的歷史的紀載看，也足以說明諸葛用人有機心，一猜二察三不信任這些看法不大正確。批評諸葛培養幹部不夠，我完全同意，說他待才如此如此，却以爲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實在，當時魏蜀吳三國，以地理而論，蜀地很小，因此人才也不能如魏吳之盛，即如現在的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這種小國家，它也不能產生出羅斯福史達林這種人才。正如習鑿齒所說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諸葛要想培養一個如自己一樣的人才也並不易找。並且人才雖有，也要注意到他的品節和忠忱，有些有才具的人，但他品節不稱，正所謂才足以濟奸，培養起來，反足以養癰爲患。譬如芸生先生說到的彭灤、廖立，我也承認是有才具可以培植的人，但一則有野心，一則屬爭權奪利之輩，品節都不純。芸生先生以爲諸葛對他們猜忌不能容人，但我們要想當時的環境，彭灤是蜀人，他不過做了一個「治中從事」，便「形色囂然」，這樣的人，將來位高權重，如何能控制得住，諸葛一生謹慎，他對劉備說「漾心大志廣，未可保安。」正是他的忠慮，後來彭灤鼓勵馬超造反，「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其心叵測，可以想見。廖立的功勞，怎能比得上諸葛，而他自以爲宜居諸葛之貳，並且驕矜慢謗，近於疏狂，這種以己一權利地位爲重的人，究非大才具。至於說對楊儀，魏延的機心，我相信諸葛未必就有心要使他們自相殘殺。魏延的個性倔強而勇敢，是諸葛所知的，因他勇敢才要留他斷後，又

怕他倔強不接受命令退軍，貽誤全軍，不得不說「不從命，軍便自發。」後來的事，那是蔣琬費禕處置得不當罷了。

諸葛的親校簿書，我們說他過於謹慎不應如此小事操勞則可，說他不放心用人也似乎說得略重。諸葛并且也是樂於接受別人的直言的，他曾說：「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徐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直言也，他心胸并不怎樣偏狹不能容人也。也不能他不誠心，布公道。

他的待才，也有幾個史證說明他的寬大與謙虛：劉琰風流善談，但言語放誕，不肯切實負責做事，武侯責備他，後琰表示改過，復其官位如故。劉巴以智術見長，諸葛曾對劉備說：「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許靖年高有名，諸葛爲之下拜。蔣琬爲廣都長，劉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大怒，將要殺他，諸葛代求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願重加察之，劉備乃不加罪。

優遇馬超和栽培姜維，也是諸葛一片養才之心。他對姜維很是賞識，說他：「忠勤

時事，思慮精密，敏於軍事，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諸葛大有栽培他作繼承人之意，可惜他是半路來歸，時候年資還未及得上，諸葛便已去世，論到人才，我却以爲姜維倒是第一流人才，而不該將他列爲第三流。且看他後來聽說後主投降，各軍都砍刀於石，表示憤慨，他的忍辱投降，一方面是後主自己已經投降，有命令迫他，一方面是企圖暫時忍辱以圖再舉的無可奈何之事。他要設計使鍾會以手段消滅鄧艾，然後殺會，以復漢室。密書與後主說：「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後安，日月幽而復明。」義胆忠忱，足見諸葛知人之明，倘使諸葛遲死數年，假姜維以時日，他培養姜維作爲承繼人是可以成功的。

諸葛在蜀可謂一身繫大局安危，他的政策是安內攘外，除賊復漢，他的忠盡辛苦可昭天日。他在人事關係的處理上，自然頗費苦心，但這不能算是機心待人，而是爲了安內的政策，務求人事的調協，各盡其用，在這點上，諸葛有時還不能不遷就別人，有他難言的苦衷，譬如關羽，他是劉備的嫡親幹部，「恩同兄弟」，劉備尊信孔明，但也親信關羽。備與諸葛情好日密，關羽張飛曾表示不悅。而關羽是一個「剛而自矜」的人，他的

長處是能打仗，却沒有政治頭腦，然而諸葛却不能不遷就他，我們可舉一事爲例：馬超來降，關羽馳書給諸葛問馬超「人才可誰比」？因爲馬超歸降，諸葛要寵給他，給他的地位頗高，關羽顯然有芥嫉之意，才這樣質問諸葛。諸葛的覆信是：「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馳爭光，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這足見諸葛對關羽的偏讓，後來聯吳政策是關羽一手所破壞，關羽被襲，劉備憤不能禁，大舉伐吳，給陸遜大敗於馬鞍山，精銳盡喪，蜀吳邦交，便形成一大裂痕，影響整個計劃。其中，諸葛人事應付的苦衷，可見一斑。

#### 四

附帶申論的，是說到諸葛軍事的戰略問題。雲生先生引王船山之論說諸葛軍路倒置：（一）軍事政治重心應在重慶，大軍應該沿江東下，以接荆襄，而北向宛許，由成都出漢中北伐，只能作爲輔助的行軍。（二）既已出師北伐，應如魏延計劃從子午谷直搗長安，不應繞山而西，在祁山以趨秦隴，兜大圈子。我以爲，現在批評起來很容易，當時的形勢、環境，却未必如此簡單明瞭。由重慶沿江東下，接荆襄，出宛洛，路線很



多，其中水陸並用，需要大量的舟船，供給線也需經過最多曲折，以此爲進兵主線，事實未必像說來那麼輕巧；並且假如曹操避實就虛，也出大軍直下漢攻蜀，動搖根據地，便又奈何？諸葛用兵，非常謹慎，唯能守而後可言攻，川蜀是建國根據地，絕不能有失，而諸葛用兵之所以須要穩紮穩打，萬分謹慎者，乃因蜀漢之局，在軍事上祇能勝，不能敗。祇能穩打，不能冒險。一有差池，便難挽救。北伐之師，不從子午谷而趨秦隴，也是從穩字着想：「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諸葛的軍事才能，未必不如魏延，聰明也未必不如魏延，難道魏延見得到，諸葛却見不到？「十全必克而無虞」，正是諸葛的謹慎，能勝不能敗，使諸葛不得不然。如果我們說諸葛「將略非長」，似乎未見其大。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三版

# 三國人物新論

著作者 祝 秀 俠

發行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5)乍浦路七十五號  
北平(22)西單北大街一二三號

印刷者 自由論壇報

上海中正東路一六〇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金邊通子

123

新書店

上海

上海

¥0.80